



WUJIN
WENBO

武

進
博



2016/1总15期
武进博物馆 编



“环太湖艺术城”杯常州市民最受欢迎的民间十大珍宝评选活动的颁奖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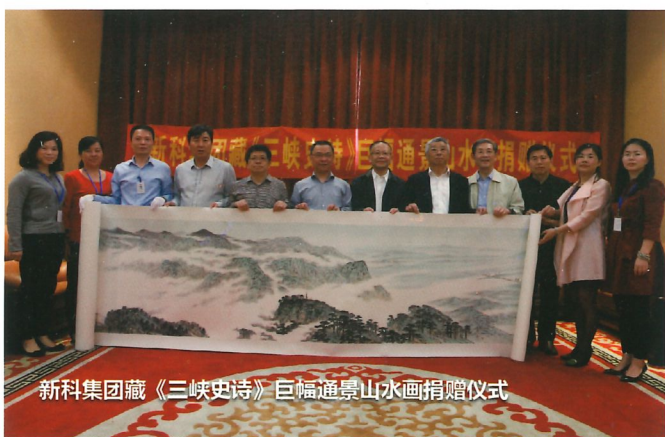
施建刚馆长、张宇副馆长参加政风热线节目录制



武进区副区长是峰一行调研我馆



我们看武博——馆校共建挂牌签约仪式



新科集团藏《三峡史诗》巨幅通景山水画捐赠仪式



武博国学大讲堂——“古乐雅韵”古代乐器专场活动走进洛阳中心小学



我馆举行迎“三八”妇女节暨第三届“武博趣味运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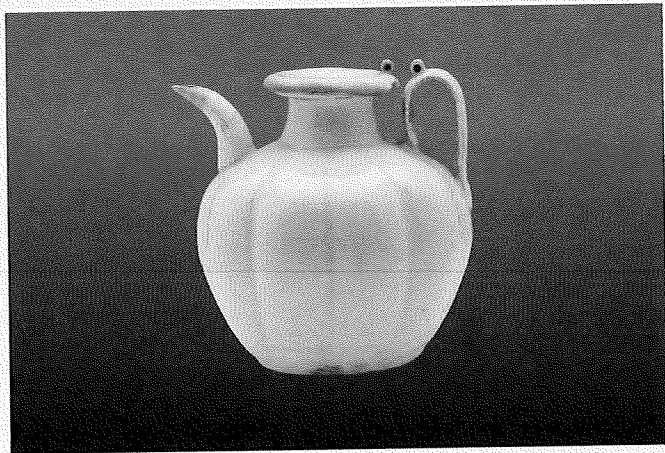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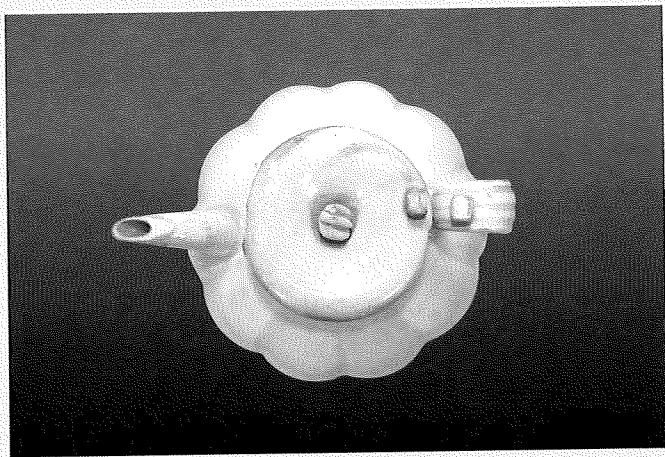
我馆开展“我爱我家——端午包粽子”活动

北宋影青瓜棱带盖执壶

北宋影青瓜棱带盖执壶口径6.3厘米，底径8.8厘米，腹围47厘米，高16厘米，重785克。

执壶敞口，短颈；器身饰有十道内凹线，仿若瓜棱；肩的一侧有弯曲细长流，相对应的另一侧贴塑扁型曲柄；长流及曲柄下均以一叶纹装饰；器口上有盖，盖内凹，卷沿，盖沿口与柄上均塑贴有一圆管状小饰物，壶底微微内凹。釉面为影青釉，晶莹润泽，有玉质感。

此件执壶出土于常州市武进区。其造型别致，壶身呈瓜棱状；釉面明澈丽洁，色泽温润如玉。为我馆二级藏品。





WUJIN
WENBO
武进
文博



2016年第1期

总第15期

顾问：徐伯元

毛健林

主编：施建刚

副主编：张彩英

编辑：张彩英

殷洁茹

编委：王颖 张彩英 张宇

芮路俊 金鑫蔚 施建刚

唐学军 谭静芬

(排名按姓氏笔画)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武宜路

(春秋淹城旅游区内)

网址：www.wjmmuseum.net

邮编：213164

电话：0519-86310589

电子邮箱：czwjmmuseum@163.com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

JS-D207

印刷：常州市大华印刷有限公司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学术研究

01 皇宫旧灯铭维艰

——沈阳故宫旧藏糠灯对清帝守成思想的指导意义 刘晓晨

藏品鉴赏

04 漫话清宫扇

范丽

07 院藏马少宣、周乐元内画鼻烟壶赏介

晓之

10 紫檀木雕花罗汉榻

张剑

11 匠心独具的铁画杰作——《溪山烟霭图》

张剑

地方史研究

12 “龙城”真源究何在？

贺忠贤

16 常州地区古桥遗存调查与保护研究

吴冬冬

20 常州杨氏渊源探

杨金达

目录/Contents

人物考评

- | | |
|----------------------------------|-----|
| 25 虞舜在舜山的活动及其影响 | 陈东夫 |
| 27 苏东坡的官场仕途心态 | 冯士彦 |
| 30 被廷杖的进士吴中行 | 吴洪生 |
| 33 一首值得一读的古诗
——武进先贤赵琬《送宗三侄还家》 | 赵德明 |

工作论坛

- | | |
|-------------------|-----|
| 35 归档文件收集不全的原因与对策 | 李香花 |
|-------------------|-----|

展苑集萃

- | | |
|--------------------------------|-----|
| 37 金猴献瑞——冯文亮猴画作品展 | |
| 38 武进天工——首届武进工艺美术精品大展 | |
| 39 紫气东来 圣旨驾到——徐州圣旨博物馆馆藏圣旨精品展 | |
| 40 精神田园的歌者——著名画家王建树山水画作品展 | |
| 41 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钱卫清书法艺术展 | |
| 42 翰墨浓情颂党恩——武进区纪念建党95周年书法美术精品展 | |
| 43 玉说——玉润堂珍藏明清玉器特展 | 金鑫蔚 |

武博纪事

金鑫蔚

皇宫旧灯铭维艰

——沈阳故宫旧藏糠灯对清帝守成思想的指导意义

刘晓晨

道光皇帝在《清宁宫敬纪》中写道：“祀神黄幔仰神龛，万福之原万世覃。义括乾坤咸得一，气周宇宙总函三。葛灯旧式先时制，土壁余风后叶谙。执豕酌匏家法守，昭明在上与天参。”^①这里说的葛灯就是糠灯。

据清代昭槁《嘯亭杂录·盛京先朝旧物》中记载：“盛京清宁宫贮文皇帝时糠灯，屡见纯皇帝之诗。”^②（“文皇帝”，即皇太极）。由此可知，糠灯是皇太极的遗物，曾存于清宁宫中，是盛京皇宫旧藏。

现如今此件糠灯的御制诗犹在，而糠灯已经不在。只有在清末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编的《增补满洲写真帖》中一窥旧时糠灯遗照。

一、糠灯的解释及其制作方法

“糠灯”一词最早见于金代周昂写的《边俗》中，诗中写道：“返阕看平野，斜垣逐慢坡。马牛虽异域，鸡犬竞同窠。木杵春晨急，糠灯照夜多。淳风今已破，征敛为兵戈。”从诗中可见，早在金代糠灯已经开始使用，是常用的夜灯。

“糠灯”作为满族先民使用的一种原始照明用具，又叫葛灯、满语叫“虾绷”或“霞绷”。据《满洲源流考》记载：“蓬梗糠秕膏傅涂，茅檐夜作每相需。绩麻乍可呼灯婢，耽奕非关消烛奴。最爱焰辉一室朗，那辞烟染满窗乌。葛灯笼是田家物，勤俭遗风与古符。”^③说明，葛灯笼（糠灯）当时是满族农家常用的照明工具，葛灯（糠灯）是随着满族

人的生活习惯的变化而改变的。满族先人多为随山穴居，后来移居平地上。夜晚以野兽油灯或松树明子照明，渔民以鱼油照明。进入农耕时代，便有了麻秆，用以引火烧饭，渐渐就发明出了糠灯。

《柳边记略》中记载：“糠灯，俗名虾绷，以米糠和水顺手粘麻秸，逆手粘则不可燃，晒干，长三尺余，插架上（以三歧木为架，凿空其端，横糠灯于中，可进退）或木牌（削木牌，凿数眼于上，悬之梁下，用与架同）。 ”^④ 据《扈从东巡日录》中载：“虾绷，糠灯也。即谷糠油和以米汁附蓬梗上，状如烛而长十倍。”^⑤“搽不蝦喇，灯架也。取三丫树断而倒置之，一茎直立，凿以衔灯”^⑥。以上的资料记载，使我们了解糠灯及

灯架的制作方法、使用方法以及基本特征。

二、满族人使用糠灯的原因

1、清入关前使用糠灯的原因

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族人使用糠灯的历史很久远，甚至于努尔哈赤创立后金政权，建都盛京（今沈阳）之初仍在使用的。

《柳边记略》及《扈从东巡日录》中提到“糠灯……燃之，光与烛等，而省费，然中土人多用油灯。”^⑦、“糠灯……燃之，青光熠熠，烟如结云，以此代烛。”^⑧可知满族人使用糠灯的原因是省费、实用、易制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先的满族人还不会制造和使用蜡烛。

2、清入关后使用糠灯的原因

满清入关后，定都北京。皇室依旧在陪都盛京（今沈阳）故宫放

置糠灯，并时时以“糠灯”来教育皇子，不忘先祖创业之艰辛。乾隆皇帝御制诗《燃霞棚观书》、嘉庆皇帝御制诗《清宁宫有感》、《旧宫再述》、《清宁宫敬纪》等，这些都是皇帝们借糠灯来做诗，用以教育后代皇帝不忘国初创业之艰，发扬淳朴之风。

道光七年(1827年)八月成书的《吉林外纪》中“御制诗歌”对糠灯的描述如下：“搏糠涂梗传之膏，继日相资夜作劳。土障葛灯应忆朴，驼头风脑漫夸豪。未知勤读邻凿壁，且佐服田宵索绹。此日旧宫试燃者，称先何异土风操。”再如《宁古塔纪略》中又写道“用苏子油，亦有麻油，稍贵，无烛，点糠灯”^⑩。可见满族人不仅仅入关前使用糠灯，入关后直至清朝道光年间居住在吉林地区的满族人仍然使用糠灯。

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清初还使用糠灯，到了清中期之后，除了偏远地区使用之外，清宫就不再使用了，仅起到教育皇子的作用。

三、糠灯在陪都盛京的摆放

据清代昭槁《嘯亭杂录·盛京先朝旧物》中记载：“盛京清宁宫贮文皇帝时糠灯，屡见纯皇帝之诗。”^⑪（“文皇帝”，即皇太极。“纯皇帝”，指弘历。）又据《翔凤阁恭贮宫殿各宫并文溯阁、夏园、广宁行宫陈设器物清册》（道光年）来看：“‘清宁宫陈设：糠灯壹架（存清宁宫，嘉庆十年奉旨安设）’”。由此证明，盛京皇宫清宁宫（皇太极的寝宫）所摆放的糠灯为皇太极曾经使用过的。

清入关以后，糠灯作为皇太极的遗物被留在了盛京皇宫，并放置在清宁宫（皇太极的寝宫）的东暖阁外间东墙壁处。

四、从御制诗中看糠灯对清帝守成思想的指导意义

如果说，糠灯起初是满族人的照明用具，那么到了清入关以后，国力强大了，缘何盛京皇宫的清宁宫会继续摆放糠灯呢？糠灯作为皇太极的遗物，当年的使用情况，现已无从可考。不过在皇宫中设置这么一盏土灯，即使只是做为一种装饰物的话，其意义亦十分深远。到了后世，糠灯便成了清帝教育子孙励精图治的活教材。

糠灯对清帝守成思想具有以下指导意义：

（一）“永守家风传奕叶，敬敷俭德示诸儿”。^⑫

乾隆皇帝末次东巡时，曾嘱咐当时在场的人，不可轻易变动清宁宫内陈设旧制。当时在场的嘉庆皇帝，在嘉庆十年东巡时忆及此事曾说过：

“葛灯土壁及祀神黄幔悉仍当日之旧。而我皇考于癸卯（乾隆四十八年）御此颁胙时一一指示，开国淳朴之风不可轻言更易。此予小子亲承庭训，永矢于聪听者也。”^⑬可见嘉庆是遵照了乾隆的遗训，认为开国淳朴之风是需要继承的。

当嘉庆皇帝发现清宁宫所置的皇太极遗物糠灯不在时，即刻召见盛京将军富俊询问，富将军答曰：“现在仅贮库内，因系糟旧，故未陈设”。嘉庆皇帝闻讯大为不满，并痛斥富俊“殊不晓事”，并曰：“先朝遗物原欲使后世企仰淳朴之风，即糟旧何碍观瞻？乃富俊于宫中所设糠灯竟视同寻常旧物，并不以时陈设，此即不知大体之一端。”^⑭之后又将糠灯移回宫中安放，从此再无人敢擅自移动。

（二）糠灯诉先祖创业之艰难。

据《嘯亭杂录·盛京先朝旧物》中记载：“盛京清宁宫贮文皇帝时糠灯，屡见纯皇帝之诗。又崇谟阁藏高皇帝旧履，以牛皮为之，护以绿

皮云头。又有先朝登山负物木架，所持拐杖，皆白木为之，制甚朴素。想见祖宗开创之艰，公刘走马之什，古今如合符节也。”^⑮

乾隆皇帝每次东巡，必率众皇子们前往清宁宫“恭瞻”先皇圣迹，并借“土壁、葛灯”来教育皇子。乾隆还写《燃霞棚观书》来歌咏糠灯：

“土壁葛灯宜此物，陈偏糠昨夜堪稽。军书如缅当年话，亦似樵蒸歆配藜。”他还特意要人在他驻蹕的保极宫也安装上糠灯^⑯，用以体会先祖创业之艰难。

（三）恪守旧制，教育子孙不忘本。

清入关后，盛京皇宫就转变成了盛京陪都。清宁宫也由寝宫、祭神的特殊宫殿变成了清帝东巡专门进行萨满祭祀的场所。

此时，对于皇家最重要的不再是开创，而是守成。据记载，清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曾先后十次出关东巡。乾隆八年弘历首次驻蹕盛京皇宫，九月二十八、三十日两次亲诣清宁宫行“九献”之祭，十月初一日又入行“大祭”礼，次日还愿，五日之内四入清宁宫行祀。在乾隆所作《世德舞辞十章》中，有一章描绘祭神时的情形：“维我祖宗，钦天敬神。执豕酌匏，咸秩无文。帷幔再张，樽俎重陈，弗渝弗替，遵我先民。”^⑰（《清高宗御制诗》一集卷十八）从皇帝东巡及亲临清宁宫的次数及诗中的内容，可以看到皇帝十分重视“维我祖宗”、“遵我先民”。

乾隆皇帝在《清宁宫》诗中云：“国朝礼重祭神，必于正寝。兹旋故宫执豕荐醑一遵旧制，弗敢废也。”^⑱可见他对旧制之重视。嘉庆皇帝在《旧宫再述》中写道：“蹕莅奉天举盛仪，禀承考训固丕基。守成保泰思其慎，肇造辛勤念在兹。土壁葛灯常景仰，祀杆神幔

永昭垂。典章钦奉休更易，敬告大清奕叶知。”^⑩

由上可证，“遵旧制”是皇帝守成思想的一种流露，也是教育子孙后代不忘本的一种苦心。清宁宫中放置糠灯就是遵旧制的一种体现，也是守成思想的一个见证。

综上所述，糠灯由农具转变成灯具，不得不说这是满族人智慧的结晶。渐渐的，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进步了，糠灯虽已不再使用了。但点滴见精神，清朝皇室不忘继承传统，皇宫供奉糠灯，且皇帝多次以糠灯赋诗，目的是以物育人，把

先人的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继承发扬。如此才奠定了清朝统一的基业，并在历史长河中存在发展三百多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中国的业绩以及康乾盛世。

刘晓晨，沈阳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副研究员。

注释：

①⑩《故宫志》。

②⑩⑭《续修四库全书·啸亭杂录·盛京先朝旧物》1179，子部，杂家类，P535，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啸亭杂录卷八，清昭槤撰。

③《糠灯》、《满族文学》，关云德，P59。

④《柳边记略》卷四，清杨宾撰。

⑤⑧《四库未收书辑刊·扈从东巡日录》，北京出版社，玖辑，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清高士奇撰，P819，扈从东巡附录五。

⑥《四库未收书辑刊·扈从东巡日录》，北京出版社，玖辑，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清高士奇撰，P818，扈从东巡附录二。

⑦《柳边记略》卷四，清杨宾撰。

⑨《宁古塔纪略》，吴振臣撰，第11页。

⑪《故宫志·嘉庆清宁宫有感》。

⑫《清仁宗御制诗》二集卷十五。

⑬《清仁宗实录》卷一四九。

⑮《漫话沈阳故宫下》，作者曲彦斌，《寻根》2005年06期，P75。

⑯《盛京皇宫》主编铁玉钦，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P330、331。

⑰《清高宗御制诗》一集卷十八。

漫话清宫扇

范 丽

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扇子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人们除用扇消暑纳凉驱赶蚊虫之外，还在扇子上留存着能工巧匠的制作技艺和文人雅士的书画墨宝，凝聚着古今工艺美术之精华，成为传承古代文明的艺术瑰宝。

一、扇子的起源和演变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扇子的国家，其上限可远溯虞舜时代。晋崔豹《古今注》云：舜为了“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明人也有“舜始造扇”的记载。^①说明舜帝时就已经有扇子。在商周时代，人们用雄雉鸡绚丽斑斓的长尾制成了“翟扇”，并出现长柄“雉扇”，此后，扇成为帝王威仪的象征。唐朝，雉毛扇改变为孔雀羽毛扇。

从考古资料看，最早的扇子图像，刻画于战国时代的铜壶，该壶出土于四川成都，壶上刻一仆人手执长柄扇替主人扇风。最早的扇子实物，是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残件。此外，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篾丝编木制长柄扇也颇具典型意义。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长柄扇，为仪仗器物，该扇长1.76米，由奴隶或仆从执掌，用以障尘蔽日，也象征主人的权威。这种仪仗用的长柄扇，在唐代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以及山西太原市开化寺的宋代壁画中也可见到。

在扇子的使用历史上，供扇风取凉用的羽扇出现得较早。据晋朝王嘉《拾遗记》云：周昭王时涂休国献青凤、丹鹊，盛夏时周昭王派人用其翅、尾之羽制成“游飘”、“条翻”、“兮光”、“仄影”四把名扇，“轻风四散，冷然自凉”。^②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社会上出现了用动物尾毛做成的拂尘，谓之“毛扇”。此外，当时还盛行以禽类羽毛制成的羽毛扇，质地洁白，毛绒柔软，轻飘舒适，尤以江南地区制作的白鹅羽毛扇最为著名，多作为贡品进献给宫廷。魏晋南北朝时，“麈羽扇”、“羽扇”

和“比翼扇”相继出现，士大夫手执尘尾扇每作清谈，含有“领袖群伦”之意。三国时期，诸葛亮、周瑜等儒将习惯手执羽扇指挥三军作战，成为历史上的著名形象。北魏时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石刻“飞天”中，有飞天女一手执扇的造型，象征飞天时的翅膀，其形状与羽扇也十分相像。

随着丝绢纺织技术的进步，绢宫扇（又叫团扇、绢扇、纨扇）开始流行。汉朝班婕妤、南朝梁武帝萧衍，唐朝刘禹锡、杜牧以及宋朝王安石等人，都写过歌咏团扇的著名诗篇。如西汉成帝妃班婕妤，曾写过一首有名的《团扇歌》：“新制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③借咏团扇表露她受赵飞燕排挤而恐受君王冷落的复杂心理。

团扇盛行于西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间，宋代以后，又与折扇并驾齐驱，深受妃嫔仕女、文人雅士的喜爱。在许多著名的古代绘画中，团扇作为最主要的器具，在画面上有所体现，如唐张萱《皇后行幸图》；周昉《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纨扇仕女图》；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均有扇子的使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扇子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制作越来越精美巧妙。从宋代起，社会上开始大量制作折扇。折扇又叫折叠扇、聚头扇，因其用时撒开，收时折叠，故又称“撒扇”。折扇扇面可用绢、纸张等裱糊制作。宋代赵彦卫认为，折扇是从朝鲜传入的，他在《云麓漫钞》中说：“宋人用折叠扇，以蒸竹为骨，夹以绫罗，贵家或以象牙为骨，饰以金银，盖出于高丽（朝鲜）。 ”^④日本学者森克己则认为：折扇初名蝙蝠扇，由日本经朝鲜传入中国。但实际上，中国在南齐（479—502年）时已有折扇了。《南齐书·刘祥传》载：“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

日”。《通鉴》注云：“腰扇既折叠扇”^⑤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期从日本传入蝙蝠扇，因式样新奇，在中国得到借鉴和改进，而形成流行的折扇样式。

现在已知最早的折扇图像，是于1977年江苏武进县南宋墓出土的戗金漆奁上，这件名为“人物花卉纹朱漆戗金莲瓣式奁”的漆器现藏于常州博物馆，其奁盖面戗画一幅“园林仕女消暑图”，一仕女怀抱纨扇，一仕女轻摇折扇。从此图可看出，早在南宋时期，折扇已在宫廷中使用。

明初之前，折叠扇较为少见，亦无流行之势。故有学者认为，折叠扇始于明永乐年间，因其受到永乐皇帝喜爱，众大臣常得赐赠，并影响到民间，因此得以大量传播，直至风行社会。

明清时期，制扇工艺十分繁盛，扇子和人们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孔尚任的《桃花扇》、《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红楼梦》中的晴雯撕扇。虽多为艺术虚构，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扇子影响之大。同时，扇面又和书画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在当时，书生文人大多怀袖折扇以示儒雅，书扇互赠蔚然成风，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几处具有地域特色的制扇专业基地，形成几个颇具影响的作坊和品牌。如创办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杭州“五星记扇庄”即为其中之一。

明清时期，有许多著名的书画大家都有扇面传世，如明代的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清代的“扬州八怪”等著名画家，其扇面作品都成为举世争藏的佳作。

二、沈阳故宫珍藏的各式清宫扇

沈阳故宫收藏清宫御用扇的历史比较悠久，据清朝档案记载，早在清代道光年间，盛京皇宫（沈阳故宫）内就收藏有清帝御用扇子。

据清朝档案记载，清朝晚期在故宫翔凤阁内，曾收藏有多件御用扇：黄竹边股白面洒金扇一柄、斑竹边股黑面金字画扇一柄、黄竹边股黑面金字扇四柄、棕竹边黄股黑面金字扇四柄、棕竹边股半金面扇一柄、刻花漆股半面洒金面一柄、黑漆边股黑面扇一柄等等，^⑥证明清宫御用扇在当时即已作为珍品，度藏于皇家宝库之中。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向沈阳故宫博物院曾调拨大量清宫杂项藏品，其中有一部分为清宫扇子，现据沈阳故宫所藏实物来看，共计有近百件，其绝大多数均保存完好。

笔者按照清宫扇子的材质和工艺，对沈阳故宫所藏各式羽扇、团扇、折扇、象牙扇及特色藤编扇、麦秆扇、篾丝扇、檀香扇等作如下介绍。

1、羽毛扇

羽毛扇制作的主要原料是大型禽鸟的羽毛，如有麻褐花点的鸬鹚翎羽、乌黑锃亮的大雁硬翎、五色斑斓有翠绿

翎眼的雄孔雀尾羽、带圆褐斑纹的猫头鹰飞羽、雪白色淡灰色的仙鹤或白鹅的硬翎等，都是制作羽毛扇的好材料。制作羽扇时，要经过采羽、选羽、刷羽、洗羽、理毛、修片、缝片、装柄、整排、饰绒等许多工序，如果要改变羽毛的原色，还需染羽。凡制作羽扇，羽片排列必须两边对称，一般只能在一只禽鸟身上拔取左右两翼同一位置的翎毛来配对成型。如果猎户在捕杀时洒落一根翼翎，就需要另找一根长短、色泽、部位相同的翎毛补上。

羽扇有高档、中档、低档之分。在清代，一般象牙柄雕翎扇最为高档。清王廷鼎《杖扇新录》记载：“雕翎扇，咸同以来，都下盛行雕扇，王公大臣皆用之。”

沈阳故宫现藏有各种羽毛扇，如清孔雀翎眼边白羽毛折扇（图1），该扇全长34厘米，股长25厘米，扇股为兽骨镂空，扇面白羽毛彩绘人物故事，外围镶用五色扇毛和翠绿的孔雀翎羽。另有清象牙柄雕翎扇（图2），该扇通长33厘米，扇面由14支精选的雕翎对称排列组成，扇托镂空卷草福寿图案。

2、绢宫扇

清代绢宫扇大多制作精细，装饰华美，品种花色很多。沈阳故宫保存有大量精美绝伦的清宫团扇，如各式彩绣、纳纱绣、双面绣、缂丝类团扇藏品，其扇面绣工及扇柄、扇坠的制作都非常精美。在这些清宫绢扇中，以圆似满月的团扇居多，其它造型的也不在少数，如有海棠形、马蹄形、梅花形、腰圆形、瓜楞形、蕉叶形、梧桐叶形等等。

清宫扇面上常绣有花鸟、鱼虫、山水图案，也有绣人物、佛像的。清宫绢扇通常绣工细密，设色精妙，光彩夺目。如沈阳故宫所藏清红木柄绿缎彩绣博古纹团扇（图3），为后妃日常随身用品，该扇长47厘米、面宽28.5厘米，为弧形蕉叶型，扇顶微向后弯曲，扇面为绿色缎制，其上双面彩绣古代器物博古图，四边为牡丹、水仙、桃花等五彩花卉图案，扇边缘为织锦边，扇面与柄杆交接处有红绣五瓣形状梅花，花内彩绣佛手、桃，边围另绣五个蝴蝶，扇柄红木刻花嵌绿骨。柄下附黄丝穗。另有清黑漆柄绢面彩绘牡丹团扇（图4），该扇全长39.3厘米、柄长13.3厘米，柄为竹质黑漆，竹节柄柄直到扇顶与黑漆边连接，扇面富贵牡丹图，画法生动雅致，为清宫佳丽用扇。

清代中期，缂丝制作曾广泛应用于帝后和其他皇室贵族、命妇的小件实用品上，这其中即有圆形、椭圆形、多边形的纨扇，如沈阳故宫现藏的清檀木柄黄地缂丝荷花双蝶团扇（图5），该扇长44厘米、宽31.5厘米，柄为檀木雕花卉嵌珊瑚柄，形状为六辨形，柄上部为绿缎彩绘花卉，扇面为黄地缂丝荷花双蝶纹，扇柄附黄色双丝穗。

3、折叠扇

清代是中国古代折扇大发展的时期，扇子在文人、官

员间的使用非常频繁，其地位更为突出，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无不钟情于折扇。乾隆皇帝就派人将元、明两代300多件（面）扇子编录成《烟云宝笈》。此外，在清宫书画注录专集《石渠宝笈》中，另收有折扇、扇面786件。沈阳故宫收藏有一定数量的清宫折扇，他们既有宫廷画家和皇帝、皇子、王公大臣制作的书画扇，也有一些著名书画家制作的扇子，其用料、做工都非常考究。如沈阳故宫藏清乌木股折扇（图6），该扇以大股乌木嵌银丝，串枝莲小股15股，股长27厘米，扇面为黑纸地，以金字楷书25行，为清中期大臣曹文植所书乾隆御制诗，背面为黑素地。落款为：“臣曹文植敬书”。另清乌木股泥金笺设色花鸟折扇（图7），此扇为乌木股，小股16股，大股透雕，股长30厘米、上径宽50厘米，一面泥金笺画桃花，钤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背面洒金笺，有行书16行，钤“乾、隆”连珠印。

4、象牙扇

象牙扇即以象牙为扇骨，因其质地细密坚韧，便于雕刻和使用，并可以染色，是名贵的制扇用料。象牙扇外观大多雕刻精美，一般综合运用浮雕、镂雕、微刻、拉花、镶嵌、粘贴等多种工艺，在设计制作上集绘画和手工多种技巧，既具有扇风取凉的实用价值，又有观赏收藏的经济价值。

如沈阳故宫博物院现藏有清象牙柄绢面绘牡丹团扇（图8）、清象牙骨金笺纸折扇、清象牙骨绢地彩绘小折扇等，它们均以象牙为扇股，分别用精纺纱、熟宣纸和细绢等作扇面，再经过堆花、彩绘、镂刻等工艺，制成精美的扇子。此外，另有包镶玳瑁、画珐琅彩绘、镶金星玻璃、镶琥珀等做工，既突出了象牙细腻润泽的质感，又将扇子装饰推向极致，为我们留下一批庄重典雅、古色古香的清宫用扇杰作。

5、藤编扇

藤是一种蔓生植物，有白藤、红藤、紫藤多种，质地柔韧。清代制扇艺人用很细的枯藤纶制扇面，经久耐用。如沈阳故宫藏清木柄藤草编镂空小团结扇（图9），该扇全长31厘米、柄长12厘米，扇面用枯藤草编制，扇心部为菊花形状，外围编制镂空两圈，扇柄为红木所制，全扇小巧玲珑。

6、麦秆扇

麦秆扇，即麦秆为扇骨，又称麦秸扇、麦草扇。采用细切的麦秆，经过漂白工艺，再染上色彩，编成精细扁宽的草带，缝制时将彩条带夹入，内圆心再绘上彩色山水宫殿，装上黑漆柄、玳瑁护托和丝线穗，显得精致高雅。如沈阳故宫藏清黑漆柄麦秸编团扇（图10），该扇长37.7厘米、宽20.3厘米，为黑漆描金嵌螺甸柄，柄背直通扇顶，镶有三处玳瑁黑盘肠纹，扇面之上压织锦

边四道，扇心为绢地，彩画楼阁，背面为黄绸质，有蝙蝠、桃等图案。这种麦秆扇现在盛产于浙江绍兴、诸暨、宁波、金华等地。

7、龚扇

龚扇选取当地山坡上的优质黄竹，须在每年秋分、白露后不久砍取，用清水浸渍，选取色泽好且无斑纹的竹子，刨去青皮，劈成篾条，细剖细磨至透明的程度，再根据设计图稿慢慢编成。一把扇子要排列编织数百根、上千根极其纤细的经丝、纬丝。如沈阳故宫现藏有清竹编灵芝、花鸟等图案小团扇（图11），即以龚式编扇工艺制成。

清朝光绪年间，四川省自流井（今自贡市）制扇艺人龚爵五编成细篾竹丝扇，扇面上有“福、禄、寿、喜”等文字或“喜鹊闹梅”等图案，深受人们喜爱。龚爵五的儿子龚雨璋进一步把名家画稿织入竹丝扇，从此龚扇名闻遐迩。

8、篾丝扇

清王廷鼎《杖扇新录》记载：“篾丝扇：来自岭表，削竹青细如缕，织成如布，光滑无痕，方、圆、六角均有之。积五六年，色自红润，风来倍凉，雅品也。”这种扇现在四川青神县也有生产，又名“青竹扇”或“竹丝扇”。如沈阳故宫院藏有清竹柄竹编扇（图12），扇面微弯，上有仁寿二字。

9、芭蕉扇

芭蕉扇，又名蒲扇、葵扇、蒲葵扇。清王廷鼎《杖扇新录》载：“古有棕扇、葵扇、蒲扇、蕉扇诸名，实即今之蒲扇。江浙呼为芭蕉扇也。”如沈阳故宫现藏有清象牙柄芭蕉扇（图13），扇柄为牙制，镂空双钱图案纹，扇径周围为寿字素锦边，扇柄部嵌饰玳瑁，柄下附丝穗。（以上列举文物图见封三）

范丽，沈阳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副研究员。

注释：

- ①林秉庄著《中国扇》，第3页，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 ②（晋）王嘉撰《拾遗记》卷二，1981年中华书局。
- ③包铭新著《扇子鉴赏与收藏》，第2页，199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
- ④林秉庄著《中国扇》第8页，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 ⑤林秉庄著《中国扇》第31页，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 ⑥（清）道光二十七年盛京内务府《翔凤阁恭贮器物清册》，辽宁省档案馆藏。

院藏马少宣、周乐元内画鼻烟壶赏介

晓之

鼻烟壶产生于明末清初，它是由生活用品升华为工艺品的。嘉庆、道光年间的沈豫在《秋阴杂记》中说：“鼻烟壶起于本朝，其始止行八旗并士大夫，近日贩夫牧童，无不握此。”^①这充分说明当时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吸闻鼻烟、欣赏鼻烟壶甚是风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贵族使用的鼻烟壶须搜集名贵材料，由技艺精湛的工匠为其设计、制造。特别是在鼻烟壶兴起并发展了二百余年的清中晚期，内画鼻烟壶已成为鼻烟壶工艺的一个奇迹、亮点。

内画鼻烟壶，也叫“里画壶”或“鬼画壶”，取其鬼斧神工之意。内画烟壶作为鼻烟壶的佼佼者，已被现代收藏者所重视，国内国际的许多收藏家普遍认为，内画烟壶是鼻烟壶艺术中集中国工艺美术之大成的袖珍艺术，它虽属把玩之物，小不盈握，造型简单，但其制作工艺却极为讲究，加之内画鼻烟壶多用昂贵的水晶、玻璃等透明材质，具有富丽华贵的风采，于方寸之间展现其逸致雅趣，故历来被人们视为“方寸之间别有天地”的珍宝，在海内外均享有盛誉。

内画鼻烟壶像其它任何一种工艺美术品的成熟过程一样，是在内画匠师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历了相当长的探索、发现之后，才逐渐成熟起来的。概括起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 内画鼻烟壶的滥觞。最初的内画鼻烟壶的内壁因为没有进行必要的磨砂处理，光滑的内壁不易着墨施彩，再加上也没有发明出一种既细小又吸墨、便于内画的笔，所以构图粗糙简单，零乱不清，装饰效果很差。

(2) 发展期。经过内画匠师们的不断实践、探索，发现了利用铁砂、金剛砂等掺水在烟壶内滚动，进行磨砂处理，使壶的内壁呈乳白色的磨砂状，细腻而不滑，产生了如同在宣纸上书画一般的效果。然后，再以弯曲成钩状的竹笔或柳木笔蘸上颜色在内壁反向作画写字。使玻璃、水晶等质地较硬的物质表面“宣纸化”，不能不说这是鼻烟壶内画匠师们的伟大发明。这一发明在内画鼻烟壶方

面，不仅有利于书画的成功，而且推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等国画题材在鼻烟壶绘制上的运用，并为仿制历史上著名书画家的作品的成功，有了可靠的保障。但是，在这漫长的中期发展阶段，虽然内画工艺有了大发展，但仍然没有达到一个较高的艺术境界，因为缺少古代书画作品必不可少的题词、落款和印章，显得匠味十足，难登大雅之堂。同时也给我们研究、了解这一时期内画鼻烟壶及其画匠资料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3) 鼎盛期。到清代光绪年间，内画鼻烟壶工艺已达到了很高水平。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工艺大师及优秀的内画鼻烟壶作品。随着工匠们的刻苦钻研与摸索，之前的许多缺陷完全得到了弥补，使内画鼻烟壶艺术日臻成熟完美，成为高雅的艺术品，以其瑰奇、高雅，便于携带、赏玩等显著优点，逐渐成为皇亲贵族、官僚士大夫和文人雅士极爱赏玩的艺术珍品，甚至被清宫大内奉为至上之物。从此内画鼻烟壶作为中国鼻烟壶的一朵奇葩，热烈盛开，与其它各种类的鼻烟壶争奇斗艳，再放异彩。经考证沈阳故宫院藏内画鼻烟壶绝大多数属于这个发展阶段的产物。

以下对其中马少宣、周乐元的几件作品略作介绍。



图1（左）清马少宣内画息肩图鼻烟壶（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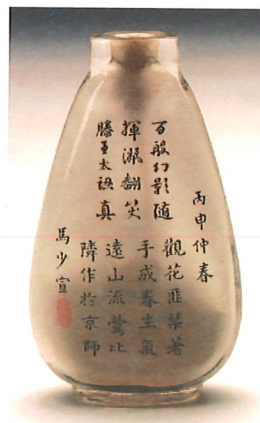


图2（右）清马少宣内画息肩图鼻烟壶（背面）

1、清马少宣内画鼻烟壶（图1、2）。高6厘米，宽3.2厘米，厚1厘米，重30克。烟壶身用整块水晶制成。晶莹剔透，通体无瑕。小口、无盖、无勺、直颈、溜肩、垂腹、壶身呈水滴形，小圈足。正面绘一花农释担小憩，所挑花篮中花卉色彩纷呈，种类繁多。人物、花木均刻画得精确细微，极富生活气息。上有题款“息肩图”。壶的背面行书题诗：“百般幻影随挥洒，翻笑滕王太认真。”又有楷书联二句：“观花匪禁著手成，春生气远山流莺”。落款“比邻作于京师，丙申仲春，马少宣”，下钤椭圆形白文印章“少宣”。这是马少宣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创制的作品。

马少宣，京派内画鼻烟壶大师，活跃于光绪年间。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归真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享年73虚岁。他家住北京牛街，回族人。据传曾为皇室御用工匠，内画技艺高超，与周乐元、叶仲山齐名。他的内画壶特点是，内画技法是一面为画，一面为书法，书画结合，相得益彰。书法为欧体，工整严谨，功力颇深。绘画多以人物为题材，如历史人物黄忠、秦琼、大小二乔以及近代人物袁世凯、张之洞、溥仪及英王乔治六世等中外名人，也有花卉鸟兽，画法娴熟，笔法精湛，形象逼真，用色浅墨，一笔不苟，能在大拇指大的壶内恭楷书写全篇《九成宫》。他的工笔“一面诗一面画”内画鼻烟壶，是他闻名于世的杰作。1915年，马少宣创作的内画鼻烟壶，曾经获得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名誉奖。1918年，在巴拿马曾荣获银质奖章。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前任主席，美国人鲍勃·斯提芬斯著有《鼻烟壶收藏手册》一书中写道：“对我来说，马少宣是内画瓶艺术家当中的毕加索。”可见马少宣的作品名扬中外，已经深得国内外藏家的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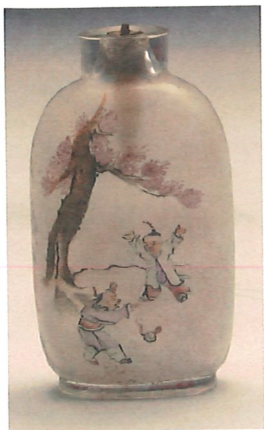


图3（左）清周乐元水晶内画鼻烟壶（正面）



图4（右）清周乐元水晶内画鼻烟壶（背面）

2、清周乐元水晶内画鼻烟壶（图3、4）。全高6.6厘米，宽3.4厘米。水晶制。小口、直颈、无盖、无勺、溜肩、直腹、短足。正面绘一松下两小童正在玩耍，小童手舞足蹈，玩得十分开心。两小童梳着满族“一块瓦”发型，玩的是满族儿童喜欢玩的踢形头（踢形头是满族传统的体育游戏。“形头”为兽皮所制的圆形球，类似请愿足球，玩时来往脚踢攻守，以踢入得分线多者为胜。）壶的背面行书落款“壬辰仲春仿南田老人大意于京师，周乐元”，旁有两方白文印章，模糊不清。这是周乐元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于京师，仿南田老人（即恽寿平）的作品绘制的。



图5（左）清周乐元套料内画兰鱼烟壶（正面）



图6（右）清周乐元套料内画兰鱼烟壶（背面）

3、清周乐元套料内画兰鱼烟壶（图5、6），高6.6厘米，腹长径5.3厘米。扁圆壶，红色珊瑚盖，直颈、溜肩、垂腹、短足。一面画五彩金鱼，共六条金鱼，三条红色的，三条黑色的金鱼。水中有水草，金鱼闲游于水中。落款“壬辰冬月写于京师藕香斋”，下钤白文椭圆形印“元印”。另一面墨画兰花，上有行草七言诗：“翠袖轻盈半掩羞，矫矫枝叶托风流。露凝清挹三分白，月染香沉一味幽。玉女浑倚湘水梦，绝人然佩谱新秋。古来名士原同调，雅淡联芳契可修。”下有“玉堂仁兄大人清赏”，下钤椭圆形白印“乐元”，右下有“山阴周氏”白文方印。可知这是周乐元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创作的作品。

周乐元，生卒年月不详。是光绪时期北京著名的内画壶匠师，原是一位宫灯、纱灯画师，在文学、绘画方面有较高的造诣，这使他在转为专门从事鼻烟壶内画以后，很快便成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目前已知周乐元的内画作品最早的是1882年，而最晚的是1893年，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周乐元卒于1893年。他的作品无论书法、绘画都给人以高

雅隽逸的艺术享受。所绘作品一峰一壑、一草一木，皆生机盎然。江南景色，学王石谷笔法，以皴染为主，方寸之中，气象万千，气韵超凡。花鸟画学新罗山人笔意，以写意为主。草虫、博古则是工写结合，色彩淡雅宜人。他的行书，笔法清秀而刚劲，墨色饱满圆润。堂款除经常署“藕香斋”外，有时也署“三十六疏斋”，堪称文人派之大家。周乐元的内画技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周乐元为“春浦仁兄”创作的内画鼻烟壶。^②周乐元在光绪七年（1881年）后创作的许多作品，现珍藏于美国、瑞士。这可以证明中国内画鼻烟壶早就经销于海外，深受海外的珍视。

分析我院收藏的马少宣、周乐元内画鼻烟壶的特点可以看到，工匠们用极细的竹笔在小小的鼻烟壶内描绘不可思议的精细书画作品要用背画技术，反笔在鼻烟壶内壁成功地进行书法和绘画创作，要求制作者必须具有较高的书法、绘画水平，甚至历史、文学修养。这种种因素都决定了内画鼻烟壶独具以下特点：

1、内画装饰不同于瓷、玻璃、铜等各种鼻烟壶的壶外装饰，它是在壶内进行装饰。在内画产生以前，鼻烟壶的装饰主要是通过雕刻、砣磨、提前施加釉料再经烘烧呈色来实现的，内画鼻烟壶则不然，它要求匠师们只凭笔和颜料，而无须借助其它手段，直接对鼻烟壶进行内画创作。在内画过程中，要锐意创新，正确选取素材，恰当地构图和布局，同时又要注意书法、绘画的内容与质地本身的统一。对于定向内画作品，还要注意与使用者之间的潜在关联。

2、内画鼻烟壶的制作对质地、壶壁、笔、颜色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能够用于制作内画鼻烟壶的原材料，以玻璃为主，另外还有水晶、茶晶、琥珀以及浅色、透明度较好的玛瑙等。为了使玩赏使用者能清楚地看清壶中书写绘画的内容，上述原材料必须透明洁净，并且要合理地打磨，使内画的内容在透过壶壁的折射过程中不至于变形损耗，影响观赏效果。无论是什么质地的原材料，壶的内壁都要进行磨砂处理，使其墨彩着落有一种类似宣纸的效果，这是因为内画所采用的基本都是中国传统的书法和绘画技法。内画用的笔也极为讲究，在鼻烟壶内壁小小的天地里，不可能如同其它书法绘画创作一样，尽情挥洒，所以它必须是一种特制的变形细笔，用它在那寸厘之间，精描细镂，反手内画，精妙入微，稍有闪失，便可能前功尽弃，由此可见要内绘一幅清晰的画面，是多么不容易。

3、内画鼻烟壶比其它种类的鼻烟壶更强调“制作者”的作用，强调个人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的发挥。这在清代中后期内外交迫、社会腐败、国不太平的环境里，显得更加重要。它就象书法、绘画作品一样，使人一看便知

是谁创作的。而一件优秀的内画鼻烟壶，往往是内画者或使用者寄寓情志的依托。清代中后期，畏于大清戒律和文字狱的严苛，愤于贪官污吏的欺榨，人们一般不轻率地议论朝政，而是好发思古之幽情，多博览古籍，考据金石，力集古人之大成。这时，体现着制作者或使用者意趣或情态的内画作品，便格外被以文人士大夫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各界人士所衷爱。

4、内画鼻烟壶从造型上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之所以引人入胜，主要体现在内画的技艺和内容上。因此当人们品评一件内画鼻烟壶时，除了质地，便是要看它是由谁书画的，书画的内容是什么，采取的是什么手法，这种手法运用得是否得当，绘画内容有无意境，等等，就如同在品评一件书法或绘画作品一样，为了使一件内画鼻烟壶作品获得成功，制作匠师们总是利用手中那支小巧的笔，寻找着制作者与使用、鉴赏者之间的神遇点，寻找共鸣。

晓之，沈阳故宫博物院保管部，副研究员。

注释：

①沈豫：《秋阴杂记》，道光十八年刊《蛾术堂集》本。

②王金海：《鼻烟壶鉴赏与收藏》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紫檀木雕花罗汉榻

张 剑



中国古代的家具艺术是特殊的艺术形态，其背后隐含着大量的信息，反映了深厚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社会风俗以及特定的生活方式，集中体现了制作者和使用者所在年代的社会制度与文化，非常具有文化研究价值。

中国古代家具中，卧具是较常见的，因此也有不少故事与此相关。这儿我们先说个小故事。据《后汉书·徐稚传》载文“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大概内容为：东汉时期，陈蕃担任豫章（今南昌市）太守，他不喜欢留造访的客人过夜，唯独对名士徐稚例外，他的公馆内特为徐稚设了一张榻，徐稚来时放下就可以用，走后就将榻吊起来，因而留下“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掌故。

卧具的形式通常以两种形式出现，即榻与床。床有架子床、拔步床两种。榻的式样不一，罗汉榻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床，一般仅作为卧具，供睡眠之用；而榻，除供睡眠外，还兼有坐具的功能。古人睡觉有大睡和小睡两种，大睡是指晚间正式的睡眠，小睡即指午休等小憩。榻用于小睡，也用来待客；床用于大睡，而不待客。而事实上，“床”、“榻”作为家具概念，似乎不可断然而别。

隋唐以前，古人的生活习俗是席地坐。宋以后虽演变为垂足坐，但盘腿打坐的习惯一直保留着。罗汉榻就是因旧俗而保留的家具品种，是一种铺为独板，左右、后背装有围档，但不带床架的榻。它自诞生以

来，就不断由朴素向华丽演变，三面的围子也由低到高，装饰亦日趋繁复。到了清代，罗汉榻出现了五屏风式、七屏风式甚至九屏风式。其正面围子，加高到令人仰视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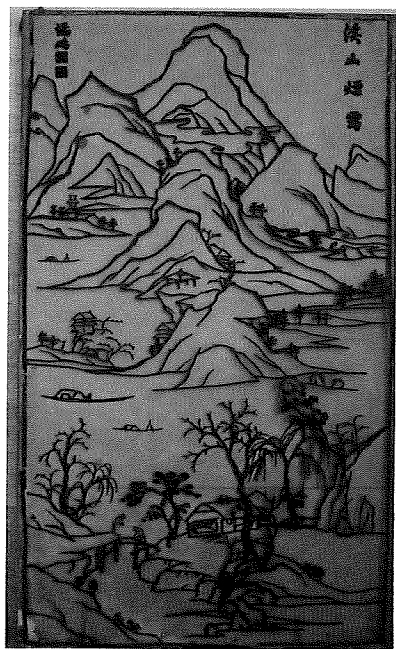
席地坐时期，生活中心必然围绕睡卧之地，待客自然也在主人睡卧之处附近。汉武帝之后，社会等级变得更为森严，待客礼节，也形成了严格的仪轨。从唐至五代《韩熙载夜宴图》起，通览历朝历代的绘画作品，可以频频见到古人以床榻为中心待客的场面。明代以降，特别是在清代，以罗汉榻待客的仪礼几乎成了定式。乃至民国，床榻或炕，都是国人待客的最高规格，或最私密会晤之所在。罗汉榻名称俚俗，但却是明、清宫廷“御座”的前身。

罗汉榻系古代大型家具之一，能历经百载以上而侥幸留存下来的十分稀少，特别是用贵重木材紫檀制作的床榻更是罕见。文中紫檀木雕花罗汉榻，为江苏镇江博物馆馆藏。长197、宽135、高50、侧高82、背高94-114厘米。山字背，七屏风式。床架及围子皆以紫檀制作，床板以金丝楠木制作，通体采用榫接法制成，不见一针一钉。围档内侧采用半浮半镂的手法雕刻云龙纹，外侧采用浅雕的手法剔刻花鸟纹，床楣半浮半镂雕刻卷草云龙纹。整器用材厚重硕大，造型稳重，装饰华丽，工艺精美，雕工刀法老练，代表了我国清代床榻家具的最高水平。该榻于晚清时期由宫廷流散民间，由镇江籍收藏家袁左良于1959年捐赠给镇江博物馆。可供单人或卧或坐、或依靠，使用方便，中间亦可放一炕桌，可对奕、叙话、用茶、休息。体现了清代家具用材厚重、装饰华丽、造型稳重、结构复杂、讲究艺术效果和富丽堂皇的特色。

中国的卧具不仅是栖身安寝的器具，同时也被广泛地用于社交等更为社会性的活动范畴，处于生活的核心位置。其形其用，虽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但还是可以循着传统文化的脉络，找到其间共通的因素，从而洞悉古人的生活态度、生活哲学与生活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卧具就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是通过物质材料展现出的抽象意韵，是混合着简约、庄重和华丽的独特美学。

匠心独具的铁画杰作——《溪山烟霭图》

张 剑



在江苏镇江博物馆的工艺品展厅里，展出了一幅名叫《溪山烟霭》的作品，很多观众会在此驻足流连，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的绘画形式——铁画。

什么是铁画？铁画又称铁花，是以低碳钢为材料，将铁片依据画稿经过剪花、锻打、焊接、退火、烘漆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艺人以锤为笔，以铁为墨，以砧为纸，锻铁为画，鬼斧神工，气韵天成，堪称一绝，是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自它诞生至今已有300多年，一直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古今中外人士青睐。

这幅铁画是“铁画之祖”汤鹏的作品，整幅画高140厘米、宽76厘米。画面充满悠远的意境。铁线刚中有柔、粗细匀称，与水墨山水画相比，毫无逊色之处。图的右上角自题“溪山烟霭”图名，左上角落款“汤鹏”二字，其下并有两方印章，一为“天池”；一为“汤鹏之印”，字体挺拔遒劲。远山重峦叠嶂，烟霭飘绕山间，层林深处亭台楼阁，若隐若现。脚下河流开阔浩渺，舟楫往返；岸上杨柳依依，农舍临水倚树；一座虹桥飞跨，桥上二人站立，互相作揖礼让，也许是隐居在山中的高士迎接来访的友人吧！

整幅图构思严谨、富有变化。上虚下实，远疏近密，小桥流水，互映成趣。画法清新简洁，仅用寥寥数笔勾勒人物形态，以大块的布白表示河流，既调剂了画面布局上的疏密，同时，又把画境引向幽谷深邃之处，给人以河山无尽之感。虽然图中景致仅以铁线勾勒，但仍能给人一种“发思古之幽情”的空灵脱俗之感，使欣赏者油然生出归隐田园的内心向往。画作各处点线面，皆形象自然，无不显示出汤鹏高超的锻打焊接技艺和绘画功底，正是“百炼钢化绕指柔，直教六清归洪炉”，以致于时人将他的技艺神化了，谓其能“随物赋形，无不如意”。

汤鹏，字天池，祖籍徽州，后迁居江苏溧水明党乡。据清代谢坤《金玉琐碎·铁画》记载：幼闻芜湖铁工汤鹏与萧云从为邻，辄观萧作画，萧恶其蠢，呵责之，汤发愤曰：‘尔谓我不知画耶，乃锻铁作画。’不久，萧云从为其坚韧意志所感动，觉其既勤学而又意诚可教。于是便与他共同切磋贴花技艺，并亲自设计画稿，教他运用“减笔皴”的手法变现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各种脉络纹理。由于汤、萧二人的相互砥砺，铁画从粗到精、从简到繁，日益成熟。汤鹏冶铸技术高超，兰竹草虫，无不惟妙惟肖，展现出幽深的意境，尤其擅长山水大幅，落笔瘦劲简洁、风格冷峭奇崛，成为一代铁画宗师。

早在雍正年间，梁同书就已记载，流传于世的汤鹏作品“多径尺小景”，而山水大幅，“世罕得之”，迄今仍有人慨叹：汤鹏的铁画“未见有款的精品”。然而，令人惊喜的是，镇江博物馆就藏有这样一件汤天池有款山水大幅《溪山烟霭图》，足令古人无憾。

镇江博物馆的这幅《溪山烟霭图》，借鉴国画的水墨、章法、布局、线条。既有国画黑白相间的风韵美，又有西画层次分明的立体美，实为了一件匠心独具的工艺珍品！

张剑，镇江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

“龙城”真源究何在？

贺忠贤

中共常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话常州》一书（201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常州别名“龙城”收入薛奇达《龙城溯源》与韦中权《常州为啥有“龙城”的别称》两篇文章，惜此两文并未找到“龙城”的真正源头。

薛奇达《龙城溯源》一文中提出三种渊源说：

一、常州古城形态“像只伏地爬行的乌龟，因龟为龙种，故称龙城。”其实龟形椭圆，龙形狭长，岂可推论。可见常州古城形态说，并非龙城真源。

二、常州划龙船源远流长的民间习俗说。“常州自明代起每年农历五……逐渐形成了东门的大青龙、小青龙；西门的金龙、白龙；北门的乌龙，城内的五色龙，六条色彩鲜艳的龙舟，在约定的时间从四面八方汇集城内白云渡……”其实，常州城内六条龙舟竞渡的民间习俗，在韦中权的文章中“龙城”的故事后半部分已讲得很清楚：化身黄龙的九龙山山神、龙王九太子委托九龙山古庙长老前往常州城内安抚六个兄长（六条恶龙），长老寻访一年来未得“龙迹”，却在民间散布了六条天龙降临常州的消息，由此引发了每年五月初五六条龙舟汇聚白云溪竞渡的民俗。可见六条龙舟白云溪竞渡并不是龙城之“源”，而是龙城故事派生的“流”。

三、是20世纪60年代组织常州灯芯绒专业化协作而得名。“1962年常州市领导从民间舞龙灯得到启发组织大成一厂、民丰纱厂、大成三厂等11个工厂配套组织成全市第一个‘一条龙’一条龙专业协作线。”常州工业因此而名震全国，赢得了“中小企业学常州”的美誉。其实这种因感悟常州舞龙灯民俗而组织的“一条龙”生产线，也不是龙城之“源”，只可称之为“流”。

可见薛奇达所说的“龙城”三渊源，均非“龙城”真源。

再看韦中权《常州为啥有“龙城”的别称》一文：

韦文开头就暗中点出龙城（“六龙城”的简称）的时代：“古辰光，常州叫‘六龙城’，又叫龙城，素有‘自古兰陵号六龙’之称。……”查常州方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一沿革：“（东晋）大兴元年，乔置兰陵郡于武进县境，领兰陵。……梁天监元年改武进曰兰陵。”“兰陵”本是山东南部的县。“兰陵”之名最早出现在江南常州均在南朝东晋、梁代。可见“自古兰陵号六龙”已点出时代。这就把龙城、六龙城镇定在两个兰陵城（一个武进县改名的兰陵城，另一个是南兰陵城）之上。这就打开了通向“龙城”真源的大门。可惜下文把“龙城”故事神化，变得扑朔迷离，反而迷失了“龙城”真源。

请看韦文的“龙城”故事（节要）：

传说秦朝时（注：比南朝梁武帝早600年），常州郡城西北数里地，有座九龙山（注：实有此山，参阅《常州府志》）。山上古庙长老宏智某晚梦见九龙山山神、东海龙王九太子对他说：“我是东海龙王九太子！600年来，我和八位兄长奉命镇守这一带群山，我是这里九龙山山神。前些时秦始皇赶山，赶跑的八位兄长要来抢占九龙山，必有一场恶战，请求长老相助，说罢化黄龙腾空而去。第三天，正是五月初五，九龙山晴空万里，百花齐放。长老应山神之请巡山一圈，正困倦想午睡，突然阴云密布，狂风劲吹，暴雨倾盆而下。便急忙回庙布置僧众在山门鸣锣击鼓，并亲率众僧诵经鸣钟助战。约莫半个时辰，天空豁然开朗。当晚长老梦见山神对他笑说：“今年群龙前来攻

山，我寡不敌众，眼看就要败北，多亏你及时率众僧以金鼓相助，得以转败为胜。现两条为首的恶龙已逃往宜兴山里，其他六龙都已逃回常州郡城。我今晚来除了感谢外，还要请你前往常州郡城寻访、安抚六位兄长（六条恶龙），希望他们在城里安居乐业，为民造福，切勿无事生非，自相残杀，每年五月初五可在（白）云溪相聚。第二天清早长老急忙到常州郡城寻访，将近一年，未见“龙迹”，却在百姓中散布六条天龙降临常州的消息，自此常州城内有了每年五月初五六条龙舟在白云溪（现已填没，位于前后北岸历史文化保护区）竞渡的民俗。

其实，“龙城”故事里九龙山山神在我国历史上实有其人，他就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至今九龙山庙里仍供奉着梁武帝神像。韦文虽一开头就打开了通向“龙城”真源的大门，却在“龙城”故事里把“龙城”故事主人公梁武帝的真实身份隐去，神化为“九龙山山神、东海龙王九太子、黄龙，”反而掩盖了“龙城”真源。

既然上述两文都未能找到“龙城”的真正源头，那么“龙城”的真正源头究竟何在呢？

“龙城”（“六龙城”的简称）的真实源头，一言以蔽之，在于南朝梁代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及其居住过并在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改名“兰陵”的武进县老城（今常州市新北区万绥镇，位于市西北八十里濒江的九龙山一带齐梁故里）。这是笔者通过对下文考证得出的结论。

正史《南史·齐高帝纪》载：南朝齐代史称“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旧居武进东城村，”即“武进县之东城里”，齐高帝就出生在祖居地；而南朝梁代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并不出生在齐梁故里，正史《梁书·武帝纪》载：“高祖（指梁武帝）以宋孝武（南朝宋孝武帝刘裕）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甲辰岁（甲辰岁，正好是“龙年”）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今南京一带）。”梁武帝萧衍虽未出生在齐梁故里，但他二十多岁时曾经在齐梁故里桑梓地居住过，这是《梁书·武帝纪》大同十年（公元544年）记载中透露的信息：“大同十年三月甲午，輿驾（我国封建社会只有最高统治者皇帝才能坐六匹龙马套驾的马车，此处指梁武帝）幸兰陵（既指东城里发展成的南兰陵城，也指改名“兰陵”的武进县老城）谒建宁陵（梁武帝父母陵），辛丑至修陵（梁武帝寿陵）。壬寅（日）诏曰：“朕自违桑梓五十馀载，乃

眷东顾，靡（无）日不思。今四方款关，海外有载，狱讼稍简，国务小闲，始获展敬园陵，但增感恻。故乡老少，接踵远至，情貌孜孜，若归于父……’因作还归乡诗……”。大同十年，八十高龄的梁武帝萧衍在诏书中自称离别故乡五十多年，岂不是透露出他二十多岁时在齐梁故里桑梓地即“武进县之东城里”居住过的信息吗？

二十多岁的萧衍当年居住在南兰陵城还是改名“兰陵”的武进县老城，必须进行考证。

在目前常州最早的方志《咸淳毘陵志》可找到青年萧衍居住过的踪迹：

“武进智宝禅院，在（武进）县（当时武进县老城因残破于五代后唐同光年间迁县于常州郡城，实行郡县同城）北七十里万岁镇，梁武帝旧第，天监七年舍为院，名慧矩，伪吴天祚间重建，太平兴国中改今额。胡苍梧（即胡瑄，宋代晋陵（今常州）人，宣和进士，曾任李纲相府幕僚，受奸相陷害，被贬为苍梧太守，著《苍梧集》）诗云：‘六代（即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因都在建康建都，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烟尘息，千年象教尊。衣冠悲故里，聚落见荒村。’”

从上述胡诗中可见到宋代时萧氏衣冠望族的齐梁故里两座兰陵城，改名“兰陵”的武进县老城、经六朝战乱后残破荒凉不堪的南兰陵城。在齐梁帝王看来，只有齐梁故里“武进县之东城里”发展成的两座兰陵城才是桑梓地。那么，梁武帝“舍宅为寺”的万岁寺及其所在地万岁（绥）镇是属于南兰陵城，还是属于改名“兰陵”的武进县老城？两者必居其一。要解答此问题必须进行考证。

据常州方志南宋《咸淳毘陵志》二十七“古迹”记载：

“武进（南）兰陵城在县北八十里千秋乡万岁镇西，南齐四世祖淮阴令萧整侨居之地。按万岁寺旧有伪吴天祚中石刻云：（万岁）寺西去萧梁帝祖宅三十里。东城村初名皇基，后百七十五步即其城也。”

按照上述记载来实测，从万岁寺所在的万岁（绥）镇向西三十里，萧梁帝祖宅东城村（里）、南兰陵城应在今丹阳境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常州市开展全市文物普查后，在万绥公社1983年8月上报的《武进县文物普查情况登记表》（油印稿）中透露了武进县老城的信息：

武进县文物普查情况登记表

表一：古文化遗址（古城、墩）

万绥公社一九八三年八月

名 称	时 代	地 址	文献记载	现 貌	备 注
武进故城	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年	万绥镇西北茶场片周围	万绥镇西北茶场片周围 《武阳合志》：“晋太康年初置县，在郡城西北八十里千秋乡，即今通江乡”。千秋乡乡址原在万绥镇，东岳庙前一座桥，称千秋桥，因之千秋乡由此得名。晋太康间建，后唐同光年间徙治常州，遂废。	已毁	茶场片平整土地时挖到城墙砖、井砖、还有开店的青龙牌。

将上述两种史料进行比对，萧梁帝祖宅、南兰陵城离万岁寺、万岁（绥）镇有三十里之遥；而曾改名“兰陵”的武进县老（故）城出土的城墙砖等文物在万绥镇附近西边茶场片出土，近在咫尺，这就充分说明万岁（绥）镇原先应属于武进县老城，是其遭战火破坏后的残存部分，排除了属于南兰陵城的可能。残破的武进县老城不再适应作县治，只得于五代后唐同光年间迁入常州郡城，实行郡、县同城，常州与武进成为一体。武进县老城迁走县治后只得缩小规模与建制，成了万岁（绥）镇。上述考证可认定，梁武帝年轻时居住过曾改名“兰陵”的武进县老城，正是万岁（绥）镇的前身。从常州方志《武（进）、阳（湖）志余》一则记载中称梁武帝“舍宅为寺”的智宝寺为“万岁寺”，又名“兰陵寺”，可反证当年武进县老城改名“兰陵县”。这就解开了梁武帝萧衍刚登上帝位，为什么就于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急忙改武进县为“兰陵县”之谜。

从《梁书·武帝纪》大同十年的记载中可看见当年勤政爱民、饱读诗书、著作等身、有“诗人皇帝”美誉的老皇帝梁武帝萧衍于其执政晚年重回阔别五十多年的故乡时，受到家乡人民热烈欢迎的动人情景，当梁武帝乘坐的六匹龙马套驾的马车缓缓驶进两座兰陵城（武进县改名的兰陵县城与南兰陵城），夹道欢迎的家乡人民以出了有作为的皇帝而自豪，遂把两座兰陵城，称为“六龙城”。出过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南兰陵城经战火破坏到隋代废弃后埋入地下，销声匿迹；梁武帝出身的由武进县改名的兰陵城（即武进县老城）被尊称为“六龙城”，“龙城”则在常武地区

传开了。所谓“六龙城”者，出过皇帝的城也。

“六龙”作皇帝代称的典故最早见诸《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齐纪七：“高宗明皇帝（即南齐明帝萧鸾）建武四年九月魏主（即北魏孝文帝元宏）遣中书舍人孙延景对宛内城守将房伯玉说：‘卿此城当（挡）我六龙之首’（其下注释：《易经》上说：‘时乘六龙以御天，人君之象也’。）”

把“六龙城”锁定在出生于“龙年”的梁武帝萧衍及其居住过的武进县老城，还有一旁证。在我国正史《南史·梁武帝纪》结尾处记载一则六龙与梁武帝萧衍有关的轶事：“初，齐高帝梦展而登殿，顾见武、明两帝后一人手张天地图而不识，问之，答曰：‘顺之后’（指梁武帝。梁武帝父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族弟、大将，曾助萧道成创帝业）……时台（指中央政府）内宿卫士为覲（男巫），常见太极殿六龙各守一柱木，忽失其二，……此覲还都（今南京）乃见六龙俱在帝（指雍州刺史萧衍，灭南齐后成梁武帝）所寝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谓同侣曰：‘萧雍州必作天子’……”“六龙”从南齐朝廷跑到湖北襄阳雍州刺史萧衍的寝斋，预示皇帝权力将转移，也说明武进县（曾改名“兰陵”）老城号称“六龙城”的真正主人是梁武帝萧衍。

常州郡城自春秋延陵，历经汉代昆陵、晋代晋陵，发展到唐代常州，从未有“六龙城”、“龙城”的别名，自从五代后唐同光年间武进县老城迁治常州郡城后，从宋代起，常州别名“六龙城”、“龙城”逐渐见于文人诗文中。南宋名相、无锡人李纲（1083—1140）在其《送梁仲谔尹武进》诗中，就有“六龙城

色郁嵯峨”之句。元末明初武进籍著名大学者谢应芳（号龟巢，1296—1392）在其所作诗词中不止一次提到常州别名“六龙城”。请看谢应芳诗中有“六龙城西吕城东，奔牛古堰卧两龙。”之句（《龟巢集》卷二）。谢应芳词《水调歌》上半阙：“牙齿豁未久，老气尚横秋。买得归耕黄犊，儿辈幸无愁。相近六龙城下，只在三家村里，结巢如小舟，倚树览山色，且免赋登楼。”（下半阙略）明万历年间，常州知府把“六龙城”的简称“龙城”来命名书院，至今龙城书院遗址仍在旧城内局前街小学。清代乾隆帝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下江南、过常州到常州首刹天宁寺拈香礼佛，应方丈之邀，御题“龙城象教”匾额。有了最高统治者皇帝题匾，自此“龙城常州”名震天下。清乾隆年间，常州人褚邦庆编写《常州赋》，赋中有“而况城号六龙，恰值六龙频降（指清康熙、乾隆两帝多次南巡）”之句。在此句之下有注释：“相传郡城为六龙城，明邹忠颖《高山志》序：‘六龙阴聚于毘陵’。……谨按郡城恭值圣祖仁皇帝（康熙帝）六巡江浙、今上（指乾隆帝）四巡，並蒙临幸……”从中可见常州郡城被称为“六龙城”以及“龙城”是皇帝的代称。晚清武进籍进士谢需在其《忝生日记》中留下“自古兰陵号‘龙城’”的名句。

当我们找到“龙城”真源后，如果再碰到有人发问：“常州为啥叫‘龙城’？”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地告诉他：常州在南北朝时期在齐梁故里“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发展成两座兰陵城，南兰陵城出了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武进县改名的兰陵城走出了南梁开国皇帝萧衍。一个地方接连出了两位有作为的皇帝是件了不起的事，令常武地区人民感到自豪，遂把两座兰陵城称为“六龙城”，简称“龙城”，武进县迁入归属的常州郡城后，常州才有“六龙城”、“龙城”的美称。

现在应揭去“六龙”故事主人公九龙山山神、东海龙王九太子、黄龙的神秘面纱，还其梁武帝的真实身份。在我国历史上南朝梁代开国皇帝极有作为，为开发我国江南、发展齐梁文化作出过卓越贡献，是一位值得后人敬仰与纪念的历史人物。

贺忠贤，常州市文管会干部，副研究馆员。

（上接第19页）

三、将古桥保护与世界遗产——大运河和常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紧密结合起来。将常州古桥纳入到大运河、常州古城保护的整体规划中去，争取更多财政支持。开展常州古桥保护行动计划，力争以三到五年的时间基本摸清常州地区遗存古桥数量，同时有选择地修缮一批古桥。再现常州昔日小桥流水的历史风韵，尽可能地为常州保留历史文脉。

吴冬冬，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馆员。

注释：

- ① 古常州府所辖一府八县，本文所指今常州市区，含金坛区。
- ②③ 《武进县志》第九篇《交通邮电》第二节《桥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
- ④ 成化《重修毗陵志》卷四《地理·桥梁》。
- ⑤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三《桥渡腴坝》。
- ⑥ 转引自《常武水乡多古桥》，《武进日报》，2009年8月4日。
- ⑦ 正德《常州府志续集》卷一《地理·桥梁》。
- ⑧⑩⑪⑬ 光绪《武阳志余》卷二《桥闸》。
- ⑨ 转引自钱世康、蒋惊雷：《武进古桥》，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 ⑫ 《武进县志》第九篇《交通邮电》第二节《桥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
- ⑭ 转引自钱世康、蒋惊雷：《武进古桥》，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 ⑮ 薛达奇：《常州晚报·砚桥》，2001年8月28日。
- ⑯ 转引自钱世康、蒋惊雷：《武进古桥》，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 ⑰ 常州文物局编：《常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⑱ 刘谨胜：《江苏现存古代桥梁保护现状的调查与研究》，《2010年古桥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常州地区古桥遗存调查与保护研究

吴冬冬

一、常州古桥道不尽

历史上常州地区^①古桥数量众多，年代久远。常州古桥最早上溯到春秋时期，经考证常州最早的桥梁为阖闾桥（现存遗址），为春秋吴王阖闾所建^②。后有三国时期吴国赤乌二年所建的内阁小桥。一座座古桥横跨河流，宛如项链上的珍珠，形式各异，点缀于常州城乡各地，斑驳多姿。一座座古桥不仅诉说着自身的历史，也见证常州千年古城的发展演变。

查阅常州史志资料，笔者对历史上常州古桥数量作粗略统计（见表一）：

数量（座）	资料来源
58	宋 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桥梁》
94	明 成化《重修毗陵志》卷四《地理·桥梁》
1283	清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三《桥渡插坝》

表一

若将光绪以降至民国所修桥梁统计在内，常州桥梁数目将更为惊人。据今人编纂《武进县志》统计，自唐至民国所建主要桥梁，至1949年时尚存1200余座^③。由此可见，历史上常州地区古桥数量极为庞大。

从统计数字看，明中叶以前，常州古桥数量不是太多，古桥数量增长也较为缓慢，常州古桥的激增是从明中叶以后开始的。这种变化与江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常州千年以来的历史发展演变是密不可分的。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常州地处江南腹地，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湿润，雨量充沛，使得这一地区河网密布，形成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小桥流水人家”的画卷。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经历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过程。这一漫长的过程持续近千年，它发轫于东晋南朝，转折于唐代安史之乱，完成于南宋时期。尤其是明中叶以后，江南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人口增加促使常州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商业城

市。商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增强和人口的流动。而常州河网密布的地理环境客观上需要大量桥梁的修建，区域经济的发展本身也具备了大规模修建桥梁的物质基础。因此，明中叶以后，常州地区出现了大规模修桥的现象。

二、古桥建造方式多

查阅相关史料，常州地区桥梁的建造方式多样，试分述如下：

一是官造桥梁。这类桥梁的修建是在地方官方的主持下，支用“官帑”修建。如状元桥，“状元桥在府学前，跨惠明河，宋崇宁郡守朱彦建，以霍侍郎端友魁多士故名。国朝洪武癸丑知府孙用重建。景泰间知府周源立状元坊于□□。成化十八年知府孙仁，同知吴桓筑□甃石。”^④又如惠明桥，清代又称府桥“府桥旧名州桥又名永安桥，宋嘉定间知常州史弥愈建，明永乐十五年知府万子雅重修，万历二十七年知府周一梧重修，三十年知府欧阳东凤重建。”^⑤

官造桥梁固然是惠民善政之举，更多的是官员为彰显其个人政绩，以博取民望，留名史志。据统计自宋以降，因督造和修建桥梁载入史志的地方官员有巡抚、知府14人，知县18人^⑥。筑桥政绩卓著者有巡抚周忱、知府李嵩、知县吴康寿等官员。李嵩仅正德八年创建或重修桥梁就有状元桥、青山桥、德安桥等10座^⑦。有时官府造桥也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筹措资金，如光绪四年奔牛万缘桥重建“拨帑五成、民捐五成”。^⑧

二是民间集资修建。由当地官员、乡绅发起募捐倡议，百姓踊跃认捐，这是旧时桥梁修建的主要方式。如南寨桥创建于明初，木质结构。嘉庆间，桥梁年久失修，乡人刘寅中倡议改建石桥，据《新建寨桥碑亭记》所载：“方桥之始事也，里人刘寅中斥产倡义。时民气殷实，乐施者众，故工良而材坚。”然而“功垂成而刘君死，故多未竟之绪。”刘寅中的病故致使石桥修建没有最后完成。三十年后，“东山之族

人达义、德容、国庆与同里钱德寿、孙敬山等同志好善，绍完前美。凡公之待成及已成而将败者集资修葺之。”^⑩道光二十年五月石质拱桥屹立于运河之上，在“同志好善”者的慷慨捐助下，完成了刘寅中的未竟之举。又如牛塘桥“咸丰庚申之变，发逆据常，拆毁殆尽，水中口石、桥背无梁，行道者苦之。”战乱之后，百废待兴，知府扎克丹倡议重修牛塘桥却苦于经费短缺。“估工须三千余缗，本地人士与四乡劝捐，历有年，所缺尚千缗。口向城中广募，邑尊绅士等交相捐助。”^⑪在地方乡绅、百姓的踊跃捐助下新桥建成，“从此通千万人之往来，开数百年之利济。”历史上常州城乡各地大小桥梁，大都由民间筹资修建，不胜枚举。

三是个人捐建。自古以来，一些仁人志士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常常乐于捐资架桥。如余宅桥失修坍塌，“光绪二年，里人何葆金捐资修造，费一千五百余缗。”^⑫民国十七年，武进县制订《业饭细力筑路法》规定：凡独资捐建一桥，钱数在一万元以上者，除奖励外，准以捐款人姓氏为桥题名并在《武进年鉴》及县志立传，这对推动捐资建桥颇具成效。后来，城区的椿庭桥、琢初桥、润之桥、世丰桥、广成桥等均为个人捐资独建。民国时期，无锡实业家荣德生组织“千桥会”，出资建造钢筋混凝土桥梁10余座。^⑬据调查武进地区现存荣氏当年助建的桥梁还有8座，其中芙蓉2座，雪堰6座。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修桥不仅方便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更与商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许多桥梁的修建都有商人财力的支持。如斗巷桥，“同治八年木行屠姓捐造。”又如西河洞桥，“光绪三年，武进知县王其淦、鹿伯元捐廉，倡率木业集资重建。”^⑭东虹桥是光绪年间一个姓虹的客商捐资修建的。^⑮南运河边上的砚桥也是一位经营木材生意的吴姓徽商捐资修建的。^⑯

三、古桥遗存数量多

常州历史上古桥数量庞大，然历经岁月洗礼，相当一部分古桥已经泯没于岁月的长河之中。尽管如此，常州遗存的古桥数量还是较为可观，仍有相当一部分古桥在发挥其作用，方便河道两岸百姓的日常出行。据今人钱世康、蒋惊雷两位老先生的多年调查和研究，武进地区目前保存古桥142座，其中石拱桥50座，石梁平板桥83座，钢筋混凝土桥9座。^⑰另据常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常州地区保存古桥154座。^⑱据统计，常州现存古代桥梁数量位列苏州、无锡之后，居江苏省第三位。^⑲可见常州古桥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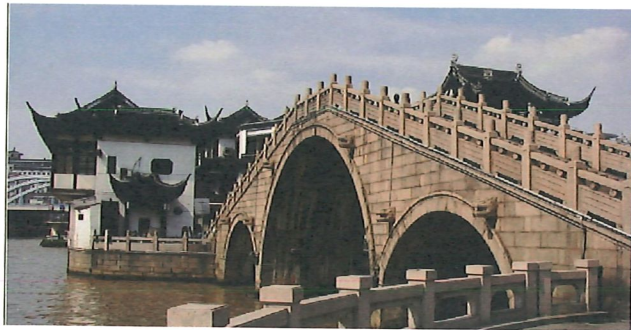
毋庸置疑，这些古桥是常州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它伴随着常州古城历尽岁月沧桑，见证了常州发展的历史。然而从数据中发现，越是接近常州老城区，古桥现存数量越少，如今常州市区古代桥梁已屈指可数，常州古桥的消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新一轮常州行政区划的调整，常州城乡一体化建设快速推进，常州古桥的生存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常州老城区依河而建、城河相表里，是常州人文荟萃之区域。遗存古迹名胜最为人称道，现将老城区遗存不多的常州古桥，择其精华而介绍。



移建后的广济桥夜景

广济桥，俗称“西仓桥”，原位于城西西直街西端的京杭大运河上。该桥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由江南巡抚周忱倡建，距今已有六百年历史。广济桥最初为木质桥，但因河阔行人多，木桥存在安全隐患，故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由南京兵部尚书、应天巡抚王恕，常州知府孙仁倡议改建三孔石拱桥。1986年因拓宽运河之故，该桥移建至东坡公园内。



文亨桥

文亨桥，跨大运河，原呈南北向，1987年运河拓宽，改为东西向。该桥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比西仓桥晚一百多年，故又称“新桥”，三孔石拱桥。桥旁为篦箕巷和古毗陵驿，每当秋夜时分，明月倒映，三个桥洞环中均能看到，景色迷人，即为闻名遐迩的“文亨穿

月”之景。据清光绪《武阳志余》卷二记载：“文亨为南北锁钥，粮艘上下踰蹄交错。”是当时重要的交通要道，在常州桥梁中享有“惟文亨雄杰为之冠”之美誉。



新坊桥

新坊桥，南北向横跨南市河，始建于梁大同元年（535年），元皇庆年间（1312—1313年）重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重修。是常州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单孔石拱桥，也是常州现存唯一一座横跨古运河的古桥。桥身由方形红石垒成，石缝为糯米浆胶合衔接，桥拱、桥基仍为明代遗物。



锁桥

锁桥，南北跨锁桥河，原名所桥，单孔石拱桥。清顺治年间倒塌，清康熙年间重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武进知县王宗濂重修，民国二十年（1931年）又重修，抗战期间，损坏严重。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江苏省公路局拨款抢修。锁桥虽经多次修建，但桥身基本保持原貌，是常州市区老运河畔保存较好的几座古桥之一。

四、常州古桥的保护对策

近年来，常州借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与申报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在古桥保护领域也相继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绩。

一、一些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常州古桥相继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现有资料统计，常州地区古桥列入省级文保单位5座，市级文保单位43座，文物保护控制单位4座（见表二）。常州市第六批候选文物保护单位的评审工作也在进行当中，相信会有更多的古桥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级别	桥名	数量（座）
省级文保单位	本善桥、庄成桥、新坊桥、五洞桥、万缘桥	5
市级文保单位	港桥、广济桥、飞虹桥、文亨桥、中新桥、锁桥、奚巷桥、南杨桥、咸安桥、三元桥、青龙桥、中市桥、村前桥（亭）、万安桥、周家胡青龙桥、周陈桥、隆兴桥、斜桥、太平桥、礼嘉双桥、漕桥、后塘村青龙桥、彩虹桥、前垛桥、万福桥、殷墅桥碑亭、石佛新桥、兴隆桥、西崦桥、宝善桥、永安桥、登云桥、镇龙桥、济善桥、毛家桥、渡江桥、翠华桥、北洋桥、张塘桥、虎臣桥、塔子桥、宜干桥、望仙桥、	43
文物保护单位	寺桥、东富春桥、河上塘桥、上店桥	4

表二

二、将古桥保护工作制度化、常态化。一方面加强古桥的文物巡查力度，设立文物保护标志碑（牌），建立文物普查点档案等工作；另一方面多方筹措资金，进一步加大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古桥的保护力度。为配合“大运河申遗”项目，2012年相继对万福桥、万安桥、新坊桥、文亨桥、飞虹桥、广济桥进行了保养维护工程，还原了古桥原貌，为常州浓郁的桥梁文化添彩。





修缮后的万福桥、万安桥

三、启动古桥保护系列行动。一方面创新工作思路，与企业合作开展古桥保护公益活动。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万福桥、锁桥、广济桥、新坊桥、飞虹桥、文亨桥等市区6座古桥树立文物保护标志碑。另一方面采用多种渠道，加大古桥保护宣传力度。相继进行了大型的古桥文化展演，“古桥魅影”摄影大赛、“话说万福桥”征文大赛、征集保护古桥好建议的“点子达人”微话题等活动。



古桥揭牌仪式



古桥保护宣传活动

依笔者浅见，对于下一阶段常州古桥保护工作，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宣传力度，普及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形成“文物保护，人人有责”的社会共识。当前古桥保护的首要任务是搞清楚常州地区古桥的遗存数量、位置、保存现状、文献记载等基础资料。这既离不开文物工作者锲而不舍的勤恳工作，更离不开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提供线索。从多年来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进程看，许多重要的文物发现都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和配合。目前，常州地区仍有许多古桥散落于乡间村落，不为人知，仅靠文物部门力量是难以搞清楚常州地区古桥现存数量的，必须充分引导城乡普通民众对于文物事业的热情参与。

二、文物部门切实履行职责，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古桥保护行动中来。一方面要引起领导重视，争取财政支持，积极筹措古桥保护专项资金，加快年久失修古桥的修缮和保护工作；另一方面要主动谋划，创新思路，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筹资”的投入机制，寻找文物保护与商业营销之间的契合点，尝试“文物搭台、企业唱戏”的路子。据史料记载，旧时常州古桥几乎一半以上都是由当地士绅望族发起募捐、筹集民资建成。现阶段古桥保护工作更应积极主动引入民间力量，努力打开常州古桥保护事业新局面。（下转第15页）

常州杨氏渊源探

杨金达

杨姓是中国第六大姓氏，也是常州的大姓。杨姓和其他姓氏一样，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大地。杨氏素有“源于三晋（山西），望出弘农”之说。晋是杨氏早期生活的地方，无论是唐叔虞的次子杼被周天子康王封为杨侯，食采于晋的杨邑；还是晋武公的次子伯侨被周天子釐王封为杨侯，封地在晋洪洞县东南的杨侯国；或者周宣王的幼子尚父被周天子幽王封为杨侯，他的封地也在晋地。杨氏执掌着晋国的大权数百年，可谓是位高权重的鼎食之家。

到了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渐渐旁落于外姓人之手。晋顷公十二年（公元前514年），国内动乱，杨姓人惨遭杀戮。杨氏祖传的食邑地杨邑也被剥夺，幸存下来的杨姓人，不得不逃离晋，渡过黄河，向南迁徙，最后在华山山脉的深山老林中找到一块地势稍稍平坦的谷地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叫仙谷。数年以后，这里设立了弘农华阴县，杨氏便落籍为弘农华阴人。杨氏子孙一直在深山老林中生活，远离官场，远离政治，默默地繁衍生息。一直到二百年以后的战国末年，有一个叫杨章的人，才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出任秦国的左庶长，他在秦惠文王十三年（公元前312年）率领部队在陕西、河南间的丹水以北击败楚军，斩首楚军八万余人，夺得楚国汉中地方六百余里。杨章立下赫赫战功，封为华阴侯。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出任高官：长子杨苞，任韩国襄王大将，驻守修武（河南获嘉县境内）；次子杨朗，为秦国大将，因战功封临晋侯；三子杨款也在秦国任职，官至上卿。从此杨氏重新兴旺起来，发展到汉朝，杨姓人再次迈向了辉煌的时代，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绩。其中杨震（杨章十二代世孙）一脉最兴旺，从杨震开始连续四代都在朝廷担任高官。杨震在东汉光武帝时任太尉（东汉时

辅助君主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官员为太尉、司徒和司空，称为三公）；杨震有五个儿子，其中第三个儿子叫杨秉，任汉桓帝时期的太尉。杨秉的儿子杨赐担任汉灵帝的老师，最后官至太尉，封为晋侯；杨赐的儿子杨彪，汉献帝时也官至太尉。杨氏“四世三公”，位极人臣，而且个个为官清正廉洁，忧国忧民，克己奉公，不徇私枉法，为朝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汉末大儒孔融高度评价杨氏的功勋，称之为：“四世清德，海内所誉。”

常武地区的杨姓人，大多数是杨震的后裔，多数是杨震五子杨奉的子孙，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的途径迁徙来常州。

一、从福建将乐经无锡双桥迁常州

杨震第五个儿子杨奉，官至户部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傅。他二十九代世孙杨荣，唐末进士，出任南剑州西镛（即今福建将乐）解官，便定居在西镛。杨荣为福建将乐杨氏的始迁祖。杨荣的第四代孙杨时，号龟山，自幼聪明好学，擅长诗文，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他进士及第后，毅然放弃官职，专程赴河南，向正在河南讲学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俩学习，十年后才重返官场。杨时为官清正廉洁，敢于直谏，历任著作郎、右谏议大夫兼皇帝的侍讲、工部侍郎，最后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致仕。杨时致仕后不顾年迈体弱，先后两次来常州路（即今天的常州、无锡一带）授徒讲学，传播理学，共十八年之久，并创建了东林书院。杨时的孙子杨航，字攸远，号济州，进士及第后任宣议郎、枢密院编修，后调任常州路通判。他认为祖父杨时曾在常州讲学多年，他们的家学在常州，为了弘扬家学，便举家入籍常州路，定居在无锡垂庆乡

双板桥。杨航是常州路杨姓人的始迁祖。现在苏南的杨姓人，大部分是从这一支繁衍起来的。《吾祖吾宗·杨》的作者田松青，在书中断言：“毗陵杨氏，为北宋理学家杨时的后裔。”此言不无道理。

杨航定居垂庆乡，一至七世合族而居。从八世开始，“以鬻或仕或耕”，不断发展。常武地区有几支杨氏就是从双板桥直接迁居过来的。

①白旂岸杨氏

杨航的九世孙叫杨□，字景影，任华亭教谕，后来被皇上赐为翰林学士。明朝洪武三十年，杨□举家迁徙到常州城城南的白旂岸圣驾街定居。杨□是白旂岸杨氏的始迁祖。他生三个儿子：老大叫湘；老二叫漆；老三叫润。成为三大房，兄弟三人分别成为三房分始祖。他们以农桑为业，在白旂岸这片沃土上繁衍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的递增，不断向四周村落拓展。如三世的杨善余徙居瓦碎坝；四世杨嵩徙居丫河；五世的杨乐宣徙居杉木浜；六世的杨周徙居塘门顶解家村；六世的杨秉良徙居常州西门外的天妃宫；十世的杨茂祥徙居茶山杨家街；十一世的杨溪徙居陈渡桥；十二世的杨文英徙居翟家村；十二世的杨永裕迁居西仓桥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一带的杨氏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②高田村、镇塘桥杨氏

武进南夏墅、鸣凰一带，是常武地区杨氏重要的聚居地区。他们也是杨航的后人。他们分两次从无锡垂庆乡双板桥迁徙过来的。第一次是杨航的七代世孙杨文亨，字悔山，举家徙居到武进的高田村，杨文亨是高田村杨氏的始迁祖。乡先贤白瑜曾给杨文亨写了一首赞诗：“龟山贤裔，将乐名胄，肇自梁谿，迁于高田，实开鸿族，子孙千亿，世德作求，仪型是式。”赞诗既赞颂了杨文亨的功绩，又写出了这支杨氏的渊源。杨文亨的孙子杨纹彬从高田村迁居到沟圩，是沟圩一脉的始迁祖。第二次迁徙是杨航的十四世孙杨瑶，字玉如，号子坤，是吴县邑庠生。因“品行端方”，被抚院邵宝推荐为武进约长乡董督乡约，大概类似现在乡镇长那样的角色。具体负责税收，调解地方上的是非曲直。杨瑶住在镇塘桥，他很欣赏镇塘桥一带的风土人情，又毗邻太湖，自然环境也十分宜人，便把全家从垂庆乡搬迁到镇塘桥定居。杨瑶便成为镇塘桥杨氏的始迁祖。杨瑶的次子杨素，字君锡。他从镇塘桥迁居到豸桥上岸，后来豸桥上岸改名为杨象园，杨素便是杨象园杨氏的始迁祖。杨瑶的二弟叫杨珮，杨珮的第三个儿子叫杨纪，字仕贞。他从镇塘桥迁居到马杭桥的荡下村，成为荡下杨氏一脉的

始迁祖。杨素大哥杨缙的第三个儿子叫杨镛，他从镇塘桥迁居到洋墟，成为洋墟杨氏的始迁祖。南夏墅、鸣凰一带的杨氏都是从高田和镇塘桥两地发展繁衍起来的。

两支杨氏来自同一处，祖宗相同。在清乾隆年间分别在高田村和镇塘桥修建了祠堂，堂号都是“四知堂”，修谱时合在一起成为一脉，共同编撰了《杨氏家乘》，民国初年，家谱重修时，高田村和镇塘桥分开来，修成两部家谱，似乎又变成了两支。

③西崦杨氏

横山镇芳茂山附近生活着一支杨氏，他们也是由无锡垂庆乡双板桥迁徙过来的。他们的先祖先从垂庆乡徙居到学宫旁，九传到杨瑄，杨瑄的侄儿杨英担任莆田教授，杨英徙居常州东北的韩区，杨英的第四代孙杨□轩入赘百丈，他的儿子杨长倩，“卜筑”芳茂山南面的西崦。杨长倩是西崦杨氏的始迁祖。他们以农耕为业，读书做官的不多，只有杨方春一人考中进士，杨自怡一人考中举人。如今横山一带聚居着七、八千杨姓人，他们都是杨长倩的后裔。

④缪贤杨氏

与无锡垂庆乡杨氏关系较近（因资料散失，无法确证）的还有缪贤杨氏。先祖杨天义，字养德，又字学仁，元末自苏州（其宗祠在苏州北寺塔附近）来常州芦墅（现五星杨家塘）设帐授徒。邻居缪贤，依附张士诚为非作歹，势大徒众。杨天义多次劝其归顺明君朱元璋，改恶从善，拯救民众，最后缪贤归降明朝。后来杨天义以理学历官詹事，缪贤也擢官。为了纪念这件美事，芦墅便改名为缪贤坝。杨天义定居在这里，子孙繁衍，发展成数千人。杨天义便是缪贤杨氏的始迁祖。

二、从江西临川迁居常州

①前黄杨氏

杨奉的二十三代世孙叫杨承休，进士及第，累官至司农卿，刑部员外郎。在唐朝昭宗年间赴吴越做官，因路途遥远，道路阻塞，加上匪患频繁，往来诸多不便，便在杭州的钱塘县（今杭州市）定居下来。杨承休便是钱塘杨氏的始迁祖。杨承休的六世孙杨讽，到江西临川拜谢无逸先生为师，专攻《春秋》，后来便在临川结婚生子，定居在临川。北宋昭定年间，杨讽的五世孙杨士英“挟资游常州”，被常州城城南钱垛桥村的优美的自然景色、纯朴的风土人情深深地吸引了，便在那里购地筑屋，定居下来。钱垛桥村离前黄仅仅二华里，抬抬脚就到了。杨士英的第四代孙杨名之迁居到前黄。杨名之是前黄杨氏的始迁祖。

杨家到了前黄，恪守杨家“耕读传家”的传统，一面种地发家，一面创办双桥书院，延师督促子孙读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末清初年间，前黄杨氏成了全国著名的望族，仅土地就有“十八万亩”，常州出南门一直到宜兴一带几乎都成了前黄杨家的土地。读书也有显著的效果，有十二位进士中榜，其中一位状元——杨廷鉴，一位榜眼——杨廷鉴的重孙杨述曾，连续五代出了七位翰林，考中举人的竟有二十八人之多。明清时期，从前黄杨家走上官场的有三百多人。由于外出做官或经商，他们不断向外拓展，现在北京、天津、安徽、山东、湖南、湖北等地不少杨姓人都是前黄杨氏的后人。

②湾渎杨氏

前黄杨氏杨士英十世孙杨一和在明初永乐年间迁居前黄街南二华里处的南埭村，是南埭村的始迁祖。杨一和共生十个儿子，其中老八杨守业，字惟基，他见运村与宜兴接壤处的杨桥湾渎“形势往而复，缭而曲，土腴水媚，可钓可耕，且风俗朴茂”。在明万历中叶全家从南埭村迁居到湾渎，杨守业是湾渎杨氏的始迁祖。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经过几代人的繁衍，渐渐与前黄杨氏关系疏远，成了独立的一支，修建了自己的宗祠，取名“尚义堂”。在乾隆年间也修了自己的家谱，这支杨氏也不断向周围村落拓展。现在宜兴岷山一带有不少杨姓人，大概就是从湾渎迁居过去的。那里的寺庄杨家祠堂，当门的柱上刻有一副对联，表明他们这脉杨氏来自前黄杨氏：

前黄绵祖宅，三公龙雀宝，
清白家声远，四知世泽堂。

三、从安阳山迁常州

安阳山，原属阳湖县，现属无锡市，处于常州与无锡的交界处。那里生活着不少杨姓人。他们也是东汉太尉杨震第五个儿子杨奉的后裔。他们从哪里迁来安阳山的？有两种说法：杨奉的二十一世孙杨於陵，字达夫。他十九岁跨入进士行列；二十岁考上博学宏词科。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品德高尚，口碑好。

《旧唐书》这样评价他：

“居官守职，亦善守操，时人皆仰其风德。”

他因任职关系，由福建莆田迁入潮州，居住在东蒲鼓楼，后定居长安朱雀街新昌坊，是新昌杨氏始迁祖。他生了四个儿子，都入朝为官，其中老二杨嗣复任唐朝宰相。孙子辈中有十人进士及第，其中老三绍复的第二个儿子杨拯进士及第后，封为员外郎，迁居无锡安阳山，是安阳山杨氏的始迁祖。此说见于新昌《杨氏谱牒》，但从时间上推算，还相差几代人，疑

点较多。另一种说法，是说安阳山始迁祖杨拯是杨时十二代孙，从无锡垂庆乡双板桥迁来。此说见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杨翼凤在《无锡安阳杨氏族谱·序言》中所说：“尝溯吾杨之在锡也，世远靡据，惟是十二世祖讳拯，当元之时择安阳之麓家焉。”乾隆十八年十五世孙杨方达撰写的《重修家乘序》中说：“自文靖公至我少参（即杨拯）公，又阅十八代，统而计之，少参为关西八十二代孙也。”这一种说法，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域上考证，是可信的。但还需从垂庆双板桥杨氏谱牒中得到证实。但无论是那一种说法，可以确认安阳杨氏是杨震第五个儿子杨奉的后裔。现在常武地区有三支杨氏是从安阳山迁居来的。

①横巷杨氏

始迁祖杨拯在安阳山富饶的土地上定居后，以“耕读”传家，很快繁衍发展起来。而且科场也不断有喜讯传来，不断有子孙走进官场。正如白炳勋撰写的安阳《杨氏续修宗谱序》所说：

“六世宜圃公以甲科（进士及第）历任至巡抚，十一世凤麓公以甲科历任至太仆，均崇祀乡贤名宦，安阳遂为望族。厥后簪缨勿替，代有闻人。”

安阳杨氏与相隔仅三十华里的前黄杨氏遥相呼应，成为当时常州府显赫的两大杨姓家族。

安阳杨氏杨拯十世孙杨守何，字敬甫，号存心，太学生，历任应天府经略，迁徙常州城局前街鸣珂里，开创了安阳杨氏在常武地区繁衍的新局面。杨守何是安阳杨氏在常武地区的始迁祖。杨守何迁居常州后，他的子孙在科举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杨守何的孙子杨兆升、杨兆鲁、重孙杨企震皆中进士榜，他的后世子孙中还有杨伦、杨炜、杨景弼、杨安国、杨开第考中进士。尤其是杨伦，文学上颇有成就，是毗陵七子之一。这一脉杨氏也是常州颇有名望的鼎食之家。他们以局前街为中心不断向周围拓展。昆山儒人沙骏声在他撰写的《谱序》中，这样来描述他们的拓展情况：

“毗陵城南迁居横巷里，始迁祖文臣公也；自郡城局前迁居西顾，分祖则廷玉公也；自郡城迁居鱼池村，分祖则志政公也；自局前迁居湖塘桥，为底坝头分祖，则芝房公也；自局前迁居湖塘桥，为竹园邨分祖，则芝宝公也。”

这一脉杨氏除了一部分散居在常州市城区外，大部分聚居在湖塘桥和武进港桥一带，尤其是横巷村周围村落聚居了这一脉近一半的杨氏族人，祠堂也于清

朝中期修建在横巷村。

②前杨杨氏

安阳山山脚下还有一脉杨氏。这一脉杨氏是杨於陵老二杨嗣复的后代。杨嗣复，字继之，号庆门。他七、八岁就能秉笔作诗为文，世称神童，年二十岁进士及第，累官至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唐文宗朝出任宰相，《全唐诗》和《全唐文》皆选有他的数篇诗文。杨嗣复生了四个儿子，其中大儿子杨授的后代杨大球是武进虞桥以北荡下村杨氏的始迁祖。老三杨枝的十三代孙杨齐，字思贤，他的祖父杨载，即宋朝大诗人杨万里的重孙。他随南宋政权的南迁移居钱塘，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他举家迁徙到“宜于耕作，人心淳朴”的安阳山，与杨拯那一脉互为邻居，他们相隔仅数里。杨齐的十代孙杨廷葵、杨廷兰兄弟俩人，因安阳山地区盗匪猖獗，时有倭寇侵扰，便在明朝嘉靖年间，迁居武进横林上塘西北偶的漕渠之侧，筑室定居，后来又觉得那里不太适宜，又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搬迁到芦荡田较多的二贤里（即现在的前杨和后庄村）。杨廷葵与杨廷兰分别为前杨和后庄村杨氏的始迁祖。至今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③漕桥杨氏

漕桥杨氏与前杨杨氏都是杨齐的后代。杨齐的孙子杨熊如，字梦祥，从安阳住基村迁居葛巷，是葛巷杨氏的始迁祖。杨熊如生四个儿子，小儿子杨贞，字国新，他从葛巷徙居到常州的“西郭”。杨贞的次子杨承禄，杨承禄的儿子叫杨林，字向南。因“设帐漕桥，爱其淳良、敦朴，于是筑室而居之”。杨林便是漕桥杨氏的始迁祖。漕桥“东临震泽，西近太湖，南接阳羨（宜兴），北达兰陵（常州市），是水陆交通之区，亦人才叠出之所”。杨氏迁居漕桥，如鱼得水，发展繁衍很快。从杨林的第四代杨间湖开始，便“科第连绵，三世蜚声庠序”，成了一时之盛事。漕桥杨氏也便成为鼎食之家的望族。

四、从浙江钱塘（今杭州市）经无锡鸿山迁常州

鸿山杨氏是新昌杨氏杨於陵的后代。杨於陵的老二杨嗣复有五个儿子，老二叫杨授。他的十三代世孙叫杨邦义，他进士及第后，曾担任溧阳令，后任沿江总制司，驻建康（今南京市）。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帅完颜宗弼率大军进攻建康，建康守军主帅陈邦光不战而降，带领大小小宋军官吏出城迎接金兵入城。杨邦义坚决不从，誓死不投降，“以血大书衣襟曰：‘宁作赵氏鬼，不作他邦臣。’”最后被

完颜宗弼剖腹剜心就义。如今南京雨花台仍有“杨邦义剖心处”的纪念碑。杨邦义的长子杨璿（又名杨振文，字伯璿，号杖庵）随着南宋朝廷迁居钱塘县。他每年要往建康祭拜父亲杨邦义，路途遥远，常在无锡鸿山住宿，便在鸿山建屋。后来杨璿的孙子杨燧干脆迁居无锡鸿山。杨燧便是鸿山杨氏的始迁祖。常武地区三支杨氏是从鸿山杨氏迁徙而来的。

①罗巷杨氏

鸿山杨氏始迁祖杨燧的孙子杨震发，生七个儿子。老六杨文煊，字彦德，入赘苏州陈氏，生两个儿子。长子杨纯，字敬，号敬宗，郡庠生。一次游常州，遇元明兵革，归途又遇盗贼，便赘居武进城南罗巷马氏，后收徒授学数十年。杨纯便是罗巷杨氏的始迁祖。杨纯生四个儿子，老四杨杰也生四个儿子。杨杰的老三杨佩，是前分支始祖。杨纯老大杨庸的孙子杨镜，迁居虎溪周家舍，是虎溪周家舍杨氏的始迁祖。杨庸的另一个孙子杨铁和他的重孙杨柏父子俩，迁居乌干，是乌干杨氏的始迁祖。杨庸的一个重孙杨鍊徙居南宅夹山下，是南宅夹山下杨氏的始迁祖。罗巷杨氏是如今戴溪南宅一带人丁较兴旺的一支。

②南圻杨氏

南圻杨氏也是鸿山杨氏杨邦义的后裔。杨邦义长子璿的第六代世孙杨焕，他的儿子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杨侃的孙子杨复迁居南宅山下，老四杨俊，字贤书，在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从鸿山徙居武进南圻，是南圻杨氏的始迁祖。杨俊的十一代世孙杨兆宗迁居下庄，是下庄杨氏的始迁祖。杨俊另一个十一代世孙杨士焕，字君文，号仁厚，从南圻定居官庄，是官庄杨氏的始迁祖。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形成了一支很大的家族群。

在常州新北区和武进嘉泽、湟里一带生活着一部分杨姓人。他们祖上是从盐城迁徙过来的。盐城有一支很大的杨氏，他们是杨邦义六世孙杨震发的后代。杨震发的第二个儿子杨文炳的孙子杨翊，字德羽，出赘梁溪吴氏，“以事谪戍和州（今安徽和县）”。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杨登一直生活在和县，老二杨青，迁居雒社。在明洪武初年，由雒社迁居盐城，为盐城杨氏的始迁祖。

③溧阳杨庄杨氏

在溧阳杨庄有一脉杨氏，他们也是杨邦义的后代。在建康将陷时，杨邦义叫侄儿杨孺文护送邦义母亲和他的第三个儿子昭文逃亡溧阳，落脚在沙溪。因江西吉水祖居村叫杨庄，也以“杨庄”称之。据《沙溪杨氏宗谱》载杨邦义上代承传世系与鸿山杨氏截然

不同，他们不是新昌杨於陵的后代，而是庐陵杨轺的后代。杨震始祖十四代孙杨钧，生四个儿子。新昌杨氏是老四杨宽的后代，庐陵杨氏是老三杨俭的后代。杨宽和杨俭是亲兄弟。然而孰是孰非，有待进一步探讨。

五、从凤阳迁来常州

杨奉的二十四代孙杨承休，在唐绍宗年间，“奉使吴越”，因“杨行密乱倾侧，扰攘不得归弘农”，定居在浙江钱塘（今杭州市）。杨承休孙子杨郁，官至尚书右丞。他的次子杨轺，任吉州知县，便定居庐陵，他成为庐陵杨氏的始迁祖，是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的先祖。杨承休另一个孙子杨邵，官至尚书，迁居福建浦城，他的重孙杨亿，是宋代著名的大文豪。杨亿生三个儿子，老大杨光泰，任凤阳通判，便从浦城迁居凤阳，是凤阳杨氏的始迁祖。

常州有三支杨氏是从凤阳迁徙而来的。

①斑竹杨氏

在溧阳戴埠斑竹一带生活着一支杨氏，源于凤阳。始迁祖杨千三是杨光泰的六世孙，是在宋政权南迁的过程中来戴埠斑竹立脚的。至今也有八百多年历史了。

②港顶、贝庄杨氏

武进港顶、贝庄一带的杨姓人，也来自安徽的凤阳，有数百年的历史了。他们世系与戴埠斑竹杨氏较接近。他们共同的先祖是杨震五子杨奉二十五代世孙杨岩（杨承休的儿子），斑竹杨氏是杨岩第二个儿子杨邵的后裔，港顶、贝庄杨氏是杨岩长子杨郁的后裔。杨郁的小儿子杨轺任职吉州，便定居庐陵。杨轺生子杨光泰，杨光泰生子杨应举，杨应举任翰林院修撰。杨应举次子杨本裕，进士及第后，也授翰林院修撰。杨本裕迁居凤阳，传五世至千一、千三、千五、千十一，兄弟四人俱南迁。千五传四世为慎五，慎五长子庆一在明洪武年间迁居毗陵港顶，是港顶杨氏的始迁祖；慎五次子庆元也在明洪武年间迁居毗陵的贝庄，是贝庄杨氏的始迁祖。

这支杨氏与斑竹杨氏是同一支，在流传过程中，世系弄差了；还是另外一支，没有更多的资料验证确认。

③剩港杨氏

在武进小河四图村剩港生活着一脉杨姓人，他们也是从安徽凤阳迁徙过来的。宋真宗年间，有一位叫杨大年的人，他是翰林学士，是杨震二十六世孙。他的曾祖父杨邵由宏农迁居福建浦城。他的孙子杨本裕由福建浦城迁居安徽凤阳。杨本裕的八世孙杨千十，担任国子司业。他随高宗南渡，遂定居常州西北方向

的剩港。这支杨氏应该与溧阳戴埠斑竹杨氏关系很近，很可能是一脉的。很可惜他们的谱牒只剩首卷一本，其余的毁于文革，无法查考了。

六、由王姓改姓舅家杨姓而来

鸣凰邢村杨氏一脉，是由王姓人改姓而来的。邢村杨氏始迁祖原姓王，叫王俊二，宜兴人，在元末顺天府任职，因看不惯官场种种腐败现象，便毅然离开官场，隐姓埋名来到武进南乡邢村的外婆家，改姓“杨”，“欲泯其声迹”。他不断教育他的后代子孙以“稼穡”为业，“终身乐于畎亩焉”。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脉也发展成很大的一个家族，亦颇有名望。

杨金达，江苏省前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虞舜在舜山的活动及其影响

陈东夫

沿常州至焦溪的公路至焦溪，再沿舜河北行。沿途点点青山，犹如碧螺，皆伏于河边。河中舟楫往来，蜿蜒相衔。行约十里许，舜河在此九十度拐弯，拐弯处陡见一峰，巍然耸立在江南平原上，它就是舜山。

舜山主峰高115米，在武进、江阴这千顷平畴的苏南水乡，在舜未来之前，就称为“高山”了。4000多年前，这里被称为“南蛮”之地。当时洪水四溢，农田时常遭水浸泡，收成微薄，民生艰苦。当时，黄河流域的北边，被称为华夏民族的发源地，情况相对要好一点，华夏民族的部落首领叫舜。

舜姓姚，名重华，字都君，山东诸城人，史称虞舜。舜以禅让的方式即唐尧的帝位，他不耻下问，广泛征求四岳等大臣的意见，惩罚奸佞，举贤任能。一方面，他把共工、驩兜、三苗三人分别流放到北、南、西三方，又在羽山处死了治水不力的鲧，使得边疆皆服，民族和睦。另一方面，他启用皋陶等二十二位贤人，使其各建奇功，百业兴旺。

北方大定后，舜决定去东方巡狩。这一年，他与随从乘木筏从长江上游一路踏波而来，但见江面越来越宽，水势越来越平，便在申港上岸，登上了“高山”。其时山上松柏森森、翠竹摇曳、一片葱茏。及至山顶四顾，但见沃野百里、茅屋点点、炊烟袅袅“好一幅江南山水图”！舜极力赞叹之余，对众人说：“我要在这里颐养天年。”确实，舜自接大位以来，东奔西忙、日夜操劳，时已年近七十，毕竟年岁不饶人，他确实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休养一番。

舜的大营就扎在舜山（之前称为“高山”）上，好似革命者找到了根据地，他舒坦地连睡了几个昼夜。往后，便又开始在周围巡视，他发现当地居民用水，不是山上冲下来的黄水，就是外来入侵的洪水，水中腐枝败叶、蚊虫孳孳、混浊不清，当地人喝了这种水，患病者众多，舜命人在山北开凿水井，得数口，其味甘甜，解决了人畜的用水问题。据说，水井旁至今还能依稀看见当年牛喝水时留下的足迹。

住在山上，还须解决灌溉用水问题。舜察看山形，见舜峰前峨眉小岭，有一方凹地，便让人拓宽成池，引水入注，作为山上浇灌、生活用水，人们称其为“眉岭方池”。舜所带一行人等，需要吃粮，舜不准扰民，亲自带领部下，在山下垦地种粮，被称为“舜田”。待年余后，舜又觉当地虽气候宜人、雨水充沛，但常遭水淹，主要是雨水缺乏泄通之道。便发动组织四周乡邻，在当年秋冬时节开挖河道，河道从舜山到焦溪鹤山一线，长约十里许。年复一年，开挖了大约5年之久，此河人称“舜河”。在舜河中段（即今塘铁桥处）舜又砍下山上木材，搭建木桥一座，便民往来，这桥名唤“舜迹桥”。舜河的开通解决了武进东北部地区百姓的水涝之苦，稻麦收成从此有了保障。舜河外通长江，商贾舟楫往来，带来了贸易的便利和市场的兴旺，古镇焦溪便成为地方崛起的一方宝地。据考证，舜在舜山地区的活动时间约有6年，他的到来，开启了民智，使当时地处偏荒的古民看到了文明的曙光，人们的劳动生产方式有了改

变，劳动效率有了提高，生活质量也有所改善。人们欢欣鼓舞，把丰收的果实，竞相献给舜帝，舜坚辞不受。

舜离开后，又去了南方地区巡狩，最后“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一代伟人毛泽东曾挥笔写下“九嶷山下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壮丽诗句。

舜山人民感恩不忘舜德，很早就供奉舜帝了。唐代诗人刘长卿有一首《题舜祠》的诗：“絃绝松风生，芳祠怅落晖。祇因山鬼护，万古仰垂衣。”可见唐朝以前，人们就已在此处修建舜祠，后又改建为舜庙。舜庙建在舜山主峰，有南北两座，相对而立，殿宇巍峨，佛像庄严，楼阁殿堂，金碧辉煌。南山舜庙庙门朝南，庙有三进：头进是灵官殿；二进是大殿，塑有舜帝像，上悬匾额题“重华协帝”四字；三进是观音殿。北山舜庙庙门朝北，庙有三进，一厢楼，规模大于南山舜庙。头进东岳殿，塑有二十四孝等泥像；二进天子殿，塑舜帝像，三间两舍，翘檐飞角，殿宇宽敞，气势磅礴，正中悬有清代刘国柱手书匾额“面北朝宗”。一副对联抱柱，上联是：“德为圣人，尊为圣人，其大孝也欤！”下联是：“所过者化，所存者仁，岂小补之哉！”此联是清末盛康（邮传大臣盛宣怀之父）题书；三进是佛殿，殿内悬清代李兆洛手书“无净三昧”的匾额。一座小山上，同时建有二座供奉一个人的祠庙，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地人们对舜的敬仰。

农历三月十八，是舜的生日。这一天，四面八方的香客纷至沓来，上山烧香，纪念虞舜。除了云集的香客，还有众多的游客，场面异常热闹。久而久之，农历三月十

八这天，也就成了焦溪的节场，俗称“作节”。作节留客，家家户户准备酒菜，招待亲朋好友。说也奇怪，三月十八这天从不下雨，即使下雨，也是夜里落雨白天晴，到了中午定然云开雾散，阳光高照。当地有一流传于民间的老话：“风吹秦皇山，雨笃小山摊，晒煞舜过山”意即老天保佑，舜帝洪福齐天。舜庙几经战火毁坏，仅剩遗迹。现在，当地民众在原址上又筹资重建了新庙。

据焦溪《高山顾氏宗谱》记载，舜过山庙会，除天气晴朗游客众多外，还有两个特色：一是朝山进香。这天各地善男信女身背香袋，清晨云集于舜过山下，手捧小香炉，持引磬和木鱼等法器有节奏地敲击，在“叮叮咯”法器敲击声的伴随下，众香客三步一跪，一跪三拜，一边走，一边诵经，朝主峰舜庙进发。这段山路盘旋有三四百米，路窄陡峭，从山脚到山顶不知要跪多少次，要叩多少回，但信徒都坚持不懈，直至峰顶。二是烧手香。血气方刚的小伙在上午九时许，在山下上钩，即在右臂的皮肉下整齐地扎上一排钢丝钩，然后固定在毛竹板上，使受力均匀，再吊上铜锣或铁钟，一只手臂承受不了铜锣或铁钟的重量，再用麻绳绑在手臂上，两个年轻人用扁担扛着手臂，烧手香的人嘴咬檀香，钩上不断加麻油止血，一边走，一边敲，徐徐向山上进发，其祭拜舜帝之诚心可见一斑。两边夹道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蔚为壮观。

四千年历史长河浩浩荡荡，它淘尽泥沙、亮出金石，千年不磨，万年不灭。综观上古历史，中华文化具有三个里程碑：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舜文化。《史记》载：“天下明

德，皆自虞舜始。”舜在舜山地区的舜井、舜田、舜池、舜河、舜迹桥等众多遗迹和为民服务的动人故事，其中绝大部分得以留存和传扬。更重要的是舜留下的“德为生，重教化”的文化精神之魂，在和谐文明的今天，正在常武地区发扬光大。

陈东夫，原武进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现为武进区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苏东坡的官场仕途心态

冯士彦

《光明日报》曾举办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五大古代文学门类的袖珍读书系列问卷调查。在词和散文两类中，苏东坡得票均为第一。可见，苏东坡的词和散文最为当代读者青睐。

苏东坡“为人：通达——乐官、乐民、乐政、乐文、乐流放；为文：通才——精文、精赋、精诗、精词、精书画。”（引浙江武义教师严松之答卷）德才兼备，能文能武，勤廉惠政，豪放婉约，坎坷一生，爱民一生，故独步天下。

苏东坡“乐”生“精”艺的思想感情，前人之述备矣！

但苏东坡面对皇帝，面对“君父”，面对神圣的“陛下”，那一种官场仕途心态，似乎绝少为人论及，我们揣摩之，愿将粗浅的体会，写在下面，就教于大方之家。

苏东坡一生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君。不管叫什么“宗”，他们都是皇帝，一启口，一抬手，都能直接决定苏东坡的荣辱安危。在苏东坡眼里，这些“宗”，无一不是天日、老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无一不是英明睿智，永远正确，绝对神圣。谁能从他的诗文里找到轻蔑不敬皇帝的词儿呢？只有他的政敌，诬陷和想置他于死地的告密者，如制造“乌台”文字狱的那帮人。苏东坡对当朝皇帝即使有所腹诽，或与私人私下里对皇帝有所非议，但在他的文字里是决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有的则是忠君爱君的颂歌和贴心的表白，决不会有失敬的一言半语。苏东坡要有所作为，哪怕是皇帝、为国家、为百姓做一点好事，也得请示得到皇帝批准了才能去做。

“乌台”文字狱近十年后，苏东坡给皇帝（哲宗）的札子里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

老实，天真，句句真话！不折不扣的自供状。皇帝自己叫苏东坡“遇事即言”，可是苏东坡多次议事，皇帝就是不采纳，这不是说话不作数吗？因此“复为诗文”，希望皇帝看到，目的是“感悟圣意”。能不能说，苏东坡一生著述，大半是为“上达”于君王，“感悟圣意”呢？这也未尝不可。

别人揭发苏东坡“指斥乘舆”（指斥皇帝的车马，即“骂皇帝”），讥讪朝政，尽可毫不费劲地搜罗到苏东坡自己提供的口实。在上引的札子里，苏东坡上疏皇帝：“谗臣者乃十倍于当时（指“乌台”狱）”。形势的险恶，处境的困难，“十倍”于从前！谁又能有效地保护苏东坡呢？唯有皇帝。“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我“感恩知罪，祈天请命，激切战恐之至”。

苏东坡心惊胆战，深怀恐惧！皇帝对他实行有效的保护措施没有呢？苏东坡晚年连遭诬陷，七年间八次降级，被贬到天涯海角才赦回。每贬一次，苏东坡照例给皇帝写一次感谢信（谢表）。一流文学家写的感谢信，自然也是一流的。能不能说，苏东坡一生大半时间都在思考如何博取皇帝对他的赏识呢？这种猜想也未尝不可。

那么，这就构成了苏东坡披肝沥胆、剖心剖肺，忠爱皇帝主要的仕途政治心态。

其实，千年官场，万里仕途，这种心态，大同小

异，而非苏东坡所独有。凡非封建叛逆性格的历朝历代知识分子，谁又不然呢？一生乞求皇恩，一生感念皇恩，一生颂扬皇恩，一生报效皇恩，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宋史·苏轼传》里记载“乌台”文字狱的缘起，十分可笑。苏东坡“徙知湖州”，照例给皇帝写了感谢信。三位御史大人竟“摭其表语”，鸡蛋里挑出了骨头，从这封感谢信里找出了苏东坡反对皇帝的罪证——还有一些诗歌。问题是皇帝自己没有看出苏东坡在感谢信里反对他，由别人看出来，也就相信了吗？——至少是半信半疑。否则，“乌台”文字狱怎么也搞不起来。能从水平一流的给皇帝的感谢信里，挑剔出反对皇帝的罪证，来蛊惑皇帝，迫害大臣，这伎俩诀窍，称得上是封建政治权术的一流遗产，流传到二十世纪，连当代人亦不觉其陌生。

苏东坡经历了“乌台”狱的磨炼，更习惯于对皇帝写“诚惶诚恐”、“诚感诚惧”、“顿首顿首”、“俯伏流涕”之类话语，既是套话，又是实话。套话即公式，苏东坡的公式化官僚心态是相当明显、极为突出的。

他给皇帝看的東西，无非一切功劳归于皇帝，一切罪过归于自己。一方面多多地自我贬损，而另一方面则无限夸大皇帝的圣明。甚至连黄河决口，也必须这样说：“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害既广则利多，忧独深而喜倍。”以“天意”否定“人功”，说大灾带来大喜，何等高级的“颂圣”辩证法！苏东坡并非不懂，要绝对自觉维护天子“天助”的神圣权威。

这种心理积淀，势必成为根深蒂固的一种心态定位。

说自己，“草芥贱微，性资甚下”，“性资顽鄙”，“性资褊浅”，“名过其实”，“下掠众美，上贪天功”；说皇帝，“日月照临，乾坤覆焘”，“躬上圣之智，建太平之业”。

说自己，“少而拙讷，老益疏愚”，“愚不适时”，“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屡献瞽言”，“日趋于迷”，“叛逆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说皇帝，“天覆群生，海涵万族”，“德刑并用，善恶兼容”，恩德比天地父母还深厚。

说自己，“志大才疏”，“有过无功”，“罪戾至重”，“有丘山之罪”，“擢发难数其罪”，“狂愚冒犯”，“久合诛夷”，“案罪责情，固宜伏斧钺于两观”，“罪已甘心万死”，“重罪当膏于斧

钺”；说皇帝，汤德尧仁，“日将旦而四海明，天方春而万物作”，对苏轼格外开恩，“赦其必死，许以自新”。

说自己，“屡玷恩荣，实深惭汗”，甚至“兄弟并窃”禄位，“猖狂妄行”，咎由自取，一切苦难，一切折磨，一切不幸，都“甘如五鼎之珍”。但愿“杜门思愆”，报效朝廷，“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盖棺未已，犹怀结草之忠”；说皇帝，“汤网开其三面，舜干舞于两阶”，“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覆育”。总而言之，“明君知臣”，对他是如何的关怀备至，天大地大，比不上皇帝的恩情大。

苏东坡对皇帝的“愚忠”、“孤忠”，一片“爱君”之心，是无可置疑的。

他说“知臣者谓臣爱君，不知臣者谓臣多事”。他希望人们承认而不是否认他对皇帝的耿耿忠爱。他奉献给皇帝的每句话每个字，真诚得泣血，琢磨得珠圆玉润，锤炼得坚亮不朽，类似某种标准试金石。用之，足以鉴别一种心态模式，及其表义语言系统。这就是虽屡贬屡挫，而“益坚素守”，“洗心自新，没齿无怨”的东坡心态以及话语样板。当然是深深烙印了封建专制钤记的。

写至此，忽发奇想：苏东坡一生，究竟有没有想过要当皇帝？哪怕是想一瞬间、一秒钟。这是无从取证的。古来秀才、状元造反做了皇帝的，尚无其例。“刘项原来不读书”。即使在今天，共和国的《选举法》，保障选民竞选国家元首或地方长官的权利，也不是有很多人一窝蜂地去竞选。据此，苏东坡似乎未必想过要把什么“宗”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未必存半点“司马昭之心”。

他经历了牢狱之灾和流放之苦，饱尝了“妻孥窃笑，亲友绝交”，“人皆相传为已死”的七灾八难，首尾不能自顾，四十九岁向皇帝乞居常州，“贫病交攻，死生莫保”；六十二岁贬儋州，“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六十五岁赦还，有“七年来往我何堪”的诗句；六十六岁六月请求致仕，七月逝世。用他的话说：“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可叹他几多生命之刃，消磨在滚滚黄尘里！最后只求“粗给飧粥”，能安居桑榆而已。身体无一时一刻的自由，“长恨此身非我有”，常常向皇帝哀哀求告，这将铸就他一种什么心态？

可以看作苏东坡一生主要仕途心态定位标志的《乞常州居住表》，写在饥寒相袭，贫病交迫，近乎

穷途末路时刻，精确地概括和表露了他与皇帝不容颠倒的依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可更易的臣服屈从的官场人格。

《乞居表》从君臣犹父子的理念出发，捧一颗“葵藿之心”，“泣血书词”。总结了他前半生的得失功过，坦陈了他急如燃眉的目前困境；提出了留居常州的唯一请求，表达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诚。深沉恳切，哀婉凄楚。

有几句话，值得推敲玩味，是苏东坡仕途心态的集中反映，其普遍观照意义，是不难领会的。

一是“既有司皆以为可诛，虽明主不得而独赦”。政界险恶，苏东坡一生吃不尽的苦头，倒不完的楣，责任在“有司”，“明主”是没有半点责任的。

二是“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之语”（本《传》引神宗批示：“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向非人主独赐保全，则臣之微生，岂有今日”。感激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庆幸中有发自内心的感激。由缙绅而囚徒，由囚徒而缙绅，自己之所以能“保全”到今天，全靠了皇帝。

三是“犬马盖帷，犹有求于君父”。祈求“仁圣”的“君父”，对“犬马”继续“少赐矜怜”，恩准他安居常州。（苏东坡尝自比“空糜刍粟”的“病马”，屡屡自称为“犬马”）。在这里，敢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志不见了，敢把酒杯问青天的豪情不见了，高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气概不见了，欲把西湖比西子、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联想和哲思不见了，风流倜傥、飘飘欲仙的苏学士不见了！

苏东坡纵然有经天纬地之才，忧国忧民之心。在皇帝面前，也只是匍匐而行的一介奴才，形同“犬马”而已。全才非完人。苏东坡这种被封建专制皇权极度压抑，严重扭曲的官场人格，属于“不完美”的历史局限，有其世代不绝的久远回声。

如果我们民族的精英、豪杰、楷模，一如苏东坡，千百年来都是跪伏于地，一味诚惶诚恐，畏首畏尾，而我们对此从来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从来麻木不仁、视为当然，骨子里不能剔除和扬弃，却依然承袭和保持这一份仿佛凝固不变的遗传基因，那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可是，令我窃喜、惊喜，以至于狂喜的是，我们的苏东坡，在其和陶诗《和〈咏三良〉》中，却敢于反问：“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难道我真的是“犬马”，从君王那里一门心思乞求一个“盖帷轩昂”吗？

这是颠覆旧称谓的崭新理念，这是否定自卑自污的勇敢反问：这是一次蔑视皇权的思想大解放，这也是苏东坡扬眉吐气的一声吼。

他说：“杀身故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才是最高价值标准。君与臣，只能共同服从社稷大道、正义大节，臣哪能盲目无条件同君主保持高度一致呢？体现了极强的挑战性，和极其可贵的民主、平等思想，闪耀出理性思维的灿烂光芒。

也许他匍匐乞怜于皇帝老子时，此种叛逆性意识，早就存乎一心。趁和陶抒情，喷薄倾吐为快。这才是我们的完整、完善、完美的苏学士！

我百分之百理解了东坡先生在官场逼迫下的表现、在仕途倾轧中的心态。

当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一定与东坡先生有许多相通共鸣的地方。是否不仅在文学领域，而且也包括了政治舞台，风云变幻大起大落的浮沉体验在内呢？……

我们从苏东坡这位文化巨人的阴影里，设身处地揣摩他的仕途心态、官场人格，而后体会到了不易表达的孤独感、悲剧感和幻灭感。

如果不能唤起和建立当代人的平等心态、独立人格，我们能不陷于深深的痛苦而有所觉悟吗？

冯士彦，武进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高级讲师。武进季札研究会理事，现受聘于淹城春秋文化研究会。

被廷杖的进士吴中行

吴洪生

吴中行，字子道，江苏武进人，生卒年月不详。父亲吴性，兄长吴可行，都是进士。吴性，官拜尚宝丞（掌管宝玺、符牌、印章一类的官，正六品）。吴可行，官至检讨（翰林院文学侍从官员，六品或七品）。吴中行20岁时中了乡试，父亲告诫他不要急着进身登士，吴中行中举后就没参加翌年会试。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吴中行中了进士，因擅长文学书法被选为庶吉士，升授为翰林院编修（翰林院庶吉士实际上相当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翰林院为朝廷储材、储相之地）。当时，同样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首辅大臣大学士张居正，是吴中行的主考官，按惯例，吴中行就是张居正的门生。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二十五日，首辅张居正得到了老家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有点慌了，按照明朝当时官僚的丁忧制度（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果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任何官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必须在家里丁忧三

年。服丧期满后，再出仕。强调以孝治天下、以伦理道德为国家经纬的大明朝对丁忧制度更为慎重，按照这种规定，张居正必须回老家丁忧。

但张居正想，自己主张并一手操作的改革大业正进行到一半，万历皇帝又年轻，他一生的“理想”很可能就会在这二十七月里被他人扼杀和摧毁。

张居正这一天想的，都是怎样不丁忧，继续立于朝堂之上。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夺情”（所谓“夺情”，其实就是皇帝“不让你”回家丁忧）。因为明朝有过先例，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大学士金幼孜母死丁忧，明宣宗下诏起复；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八月，大学士杨弘济母死丁忧，随即起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三月，内阁大学士李贤父死，宪宗下诏起复（起复，就是“重新”任命使用）。这三件事情在张居正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执掌的权柄，他斟酌再三，决定策划一起“夺情”事件。

但就在他行动之前，内阁次辅张四维上疏万历皇帝，称改革

进退维谷之时坚决不能让张居正走，一定要“夺情”。因为有先例，年轻的万历皇帝就下诏起复。但据说，次辅张四维也是故作姿态，内心里早就对张居正借改革之际大批任用亲信不满。巴不得张居正回家丁忧，他好顺理成章以副代正，一举登上首辅宝座。

张居正觉得就这样不走，似乎太过明显。于是，他上疏万历皇帝，在奏折中他闪烁其词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父亲死了，我不走不好；可我一走，又如何是好？”

是啊！整个明帝国现在正在张居正的掌控下向前行进，一旦这个重臣离开，年轻的万历帝可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此时，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一时之间，朝廷上下都上疏请皇帝将张居正留下，似乎张居正一回家尽孝，天就要塌下来一样。万历帝就顺水推舟，再次口谕，要张居正必须留下。

张居正“只好”留下了。然而，为了不给反对者以口舌，张居正又装模作样、屡屡上疏，还

是要求离职守制，以尽孝道。15岁的万历皇帝一时倒拿不定主意了。但皇帝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的好兄弟、太监总管冯保的意见十分明确，坚决不能让张居正回家尽孝道。最后，万历皇帝采取折中方案：张居正留在任上守制。也就是说，朝廷事务还是要处理，但可以不上朝。这种“不坐班”的方式很让张居正受用：一方面，他的确在按大明律法“守制”尽孝；另一方面，他可以继续在朝堂行走，权力并没有被人夺去。

他本以为一切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事实却是，麻烦才刚刚开始。

当时正好天空有扫帚星（即哈雷彗星）出现在西南方，其势横扫天宇，与天庭长长相连，直冲紫微，似乎在警示百官，此乃凶兆，必有所指！天人合一系传统文化的核心，于是群情激昂，目光都不约而同聚焦首辅张居正，以至于京城十字街口、交通要道悬挂不利于朝廷的文字。一时间街谈巷议，人心浮动。

吴中行于是首先向皇帝呈上奏本。这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关键之举，不得不将原文录在这里。吴中行上疏曰：“居正父子异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幸我欲短丧，子曰：

‘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曰：‘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衰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后世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

吴中行疏本，于法、于理、于情，于前、于今、于后，于天、地、官、民，无不言及，其逻辑力量不可谓不强。

十月十八日，奏本已经送了上去，吴中行将副本送给张居正。张居正惊愕地问：“奏本已经送上去了？”吴中行倒也坦然，说：“如果没有送上去，我是不会跟你说的。”张居正咬咬牙，说：“很好。”第二天，赵用贤的奏本也送上去，对张居正极尽挖苦之能事。第三天，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弹劾张居正不丁忧枉为首辅，其身不正，“贪位忘亲”。张居正勃然大怒，与太监总管冯保商量，决定要让皇上同意，在朝廷上当众廷杖这几个上奏本的人。十月二十一日，翰林院侍讲赵志皋、张位、于慎行、张一桂、田一俊、李长春，修撰习孔教、沈懋学听说了，都上本营救吴中行等，但疏本递不进去，被冯保扣压了。学士王锡爵会集数十人，当面向张居正请求宽解吴中行等，张居正不肯接受，还把皇上搬了出来，说道，

“皇帝发怒，无人能阻！”王锡爵反应灵敏，回说道，“皇上发怒，不也是为了您吗？”张居正不予理睬，拂袖而去。

于是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等四人就被施以廷杖。张居正事先通过对比四个人的奏折，发现：吴中行与赵用贤在奏折中明白说道他父亲葬礼结束后可返回朝廷继续任职，而艾穆和沈思孝却要直接让他守制二十七个月。张居正就给吴、赵二人各打六十杖，而艾、沈二人各打八十杖。

翌日，进士邹元标上疏奏本，太监并没有怀疑，因为没有哪一个笨蛋会在别人受杖刑的时候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宦官把邹元标的奏疏交给了冯保，冯保随即又交给了张居正。张居正看后，气得简直七窍生烟，这位刑部办事进士居然在奏疏里大骂张居正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是禽兽。张居正盛怒之下在三天后果然就对邹元标进行了反击：杖一百六十，事后发配贵州都匀。在他刚被发配到贵州时，张居正派一个巡按御史去杀他。幸好苍天有眼，这个御史在离都匀不远的镇远地方忽然得急病死了，邹元标这才得以幸免。因为气候的原因，邹元标被打烂的屁股在那里足足疼了六年，直到张居正死，他才被招回朝廷。

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五人，刚直不阿的名声，震动了天下人。吴中行、赵用贤并称“吴赵二公”。南京御史硃鸿谟上疏本营救这五个人，同样遭到张居正斥骂，“夺情”事件至

此才真正地结束。综观整个事件，张居正只为不想放下手中的权力而已，说得动听一点也就是要把自以为对朝廷、对国家有利的改革推进下去。吴中行等五人，虽然时人给了他们一顶“五直臣”的高帽子戴，但是他们的屁股被打烂了，屁股也白打了，因为他们碰到的是欣赏“非常事得用非常手段”的张居正。《明史》记载，张居正不仅毫发未伤，而且“夺情起复”还完全按照张居正设计的程式演绎得完美无缺。

吴中行等受廷杖后，校尉用布条拉着他们，拖出长安门，一个个用木板抬出去，当天被赶出京城。吴中行的气息已经断绝，中书舍人秦柱急忙找来一个大夫，为他用了药，才渐渐苏醒过来。用车子载着吴中行向南方而来，回到家乡，割去腐烂的肉数十块，大的腐肉比手掌还要大，伤口深达寸许，可怜一条腿都几乎空了。

万历九年，全面考核官员，把这五个人列入考察名单中，将其禁

锢不让任职。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坚持十年（1572年—1582年）的改革，虽在经济上取得“一条鞭法”的短期效果，盖因张居正挟持年轻的万历皇帝，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加上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屡屡犯事，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当年策应张居正“夺情起复”时曾首先上书请求挽留张居正的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甚觉无趣。曾士楚行将巡按江苏、松江一带，却恍然而叹曰：“我有什么面目见吴中行、赵用贤二公呢！”于是称病而去。给事中陈三谟虽已擢升太常少卿，没有多久与曾士楚都被揭发罪状革去官职。朝廷的官吏交相推荐吴中行，皇帝下诏恢复了吴中行原来的官职，并进升右中允（系执掌侍从礼仪、驳正启奏的太子属官），后来一直升到为皇帝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经筵。

后来大学士许国攻击李植、江东之，诋毁吴中行、赵用贤是李、江同党。吴中行上本自辨，并请求辞官，皇帝不同意。不久吴中行升职为执掌侍从赞谕，职比常侍的右谕德。御史蔡系周揭发李植，又牵连并责难到吴中行，吴中行再次请求去官，接连上四道奏章。皇帝下诏，赏赐他金帛，准其告老还乡。崇尚道德修为、文章骨气的言官们，多次推荐吴中行，朝廷还是没把他召回。多年以后，上面起用他为侍讲学士，执掌南京翰林院。岂料曾经与吴中行有讼事纠纷、事情早已解决的负责都督、按察的同乡金事徐常吉不能容他，给事中王嘉谟再次旧事重提，揭发、纠缠吴中行，朝廷便命吴中行在家里等待处理意见。不久，吴中行去世。身后，朝廷赠他“礼部右侍郎”（中央六部的副长官，相当于正二品）称号。

吴中行著有《赐余堂集》十四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吴洪生，湟里高中退休教师，副高职称，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常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一首值得一读的古诗

——武进先贤赵琬《送宗三侄还家》

赵德明

武进西盖《永思堂·赵氏族谱》中，载有一首写于明代的古诗。虽是写作在五百多年前的诗，但今天读来仍有其现实意义。这首名为《送宗三侄还家》的七言诗的作者是明代正统年间，常武地区的一位大儒，他姓赵，名琬，字叔琰，晚号梅庵。赵琬学识渊博，品德方正，在北京国子监任司业多年，门生弟子遍布天下。其侄想利用赵琬的关系在京城衙门找个差事，图个安逸。不想梅庵公丝毫不念亲情，不走后门，留待数日后，就送侄回家。事后他觉得此事虽有悖常情，但也别无选择，于是就写下这首诗，感叹为官处世之不易，使我们看到一位古代官吏的清廉风格。整首古诗，有叙述有写景，有抒情有感叹，既有提醒、规劝他人之意，更多的是在反省、告诫自己。诗句平直但不乏深幽，用词简朴却不显平淡，全诗工整对仗，通顺押韵，琅琅上口，便于吟诵，值得一读。古诗全文如下：

送宗三侄还家

晨鸡三号车膏轴，行李肃肃俨装束，
出门送汝还故乡，故乡远在潞湖曲。
迢迢去路吾旧知，历历江山如在目，
几度思归未得归，心事殷勤向汝嘱，
到家先语诸弟昆，次及宗嫛与乡曲。
自我居官二十年，冷职单栖如矮屋，
低头拜揖向达官，尤防言貌轻招辱。
自料山林藜藿姿，敢慕当朝庙堂肉，
守约甘贫分所安，庶免乖违愧儒服。
亲知投遣未能报，颜厚不言心自慊，
更须为我语汝曹，无复悠悠效汝叔。
欲求生前真富贵，但求诗书窗下读，
宅旁大树汝祖种，想得种时如种玉。

好将此树比甘棠，毋教薪酒如域朴，
墓门青松吾手栽，指望他年作乔木。
别来荣悴竟如何，因风并报平安竹，
终有大事重叮咛，祖宗礼祀宜似续，
丘垅尤当时省视，勿纵儿童姿樵牧。

此诗开头几句是写清早送侄儿的情景，转而引发对家乡父老的怀念。梅庵公是武进西盖（今横林赵家塘）赵氏始迁先祖孟堙公的六世孙，上辈迁至武进怀南乡（今礼河）赵墅，距离潞湖仅有数里，儿时在此玩耍戏水，想必印象尤深。梅庵公自小聪明好学过目不忘，号称“神童”，后果然在大明永乐辛卯年间获乡试第二名，次年登进士乙榜，名声大噪，先后担任多地教谕，在山东兖州任教谕时，深得曲阜孔府衍圣公孔彦缙厚爱，被邀任孔、颜、孟三府子孙学堂教授未就。宣德十年，任国子监司业，在外居官三十多年，一直“几度思归未能归”，故只能由侄儿回家带信问候，但思乡之情一经触动就难以自抑。

接着梅庵公写到自己在京居官处事的环境现状，充满自尊自重，自觉自律之意。国子监又名太学，类似于今天的中共中央党校，是培养培训国家栋梁之才、后备干部的地方。身为国子监司业（行政二把手），深知为人师表尤为重要，事事处处都要作出表率，任何不当言行都有可能招致非议。但往往“人在官场，身不由己”，极难把握。正统初年，梅庵公因其学识品德，担任经筵讲官，曾多次为英宗皇帝讲课授业，因融汇贯通，深入浅出，深得皇帝欢心，屡获封赏，有四书五经、大红袭衣、白金宝钞等等不一，朝廷百官无不慕之。因梅庵公自幼在临近梅村的外公家读书，后来梅庵就在此建梅庵三间，另建讲堂“荷

恩亨”，这些赏品就放在此处。“荷恩亨”名著四方，引来常武各地的名公显官、文人学士瞻仰，这可能也是导致侄儿更加要来北京投靠的直接原因。但时局有变，官场诡异，风光亮丽的背后往往接着就是刀光剑影，有时正义与邪恶的碰撞交锋，正义不一定都能占上风。正统后期，宦官专权，太监王振自恃护主有功，大权独揽，践踏朝纲，肆意敛财，对本是一方净土的国子监也不放过，一次王振护驾训视，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及司业梅庵公等人不卑不亢，没有行贿，王振大施淫威，寻找借口，令他们带枷罚跪，蒙受奇耻大辱，虽然不久后王振因“土木堡事件”被诛杀，罪行得到清算，但梅庵公对朝廷政局和官场的凶险无常，还是增添了几分警觉，“自料山林藜藿姿，敢慕当朝庙堂肉”，他真的想大声说，在朝廷为官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是“高处不胜寒”，必须常怀警觉提防之心，除非你和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这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面对亲人的不理解不接受，梅庵公觉得还是要进行提醒和规劝，凡事靠自己，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在这一点上，有些人可能碍于情面难以启齿，但梅庵公秉性耿直。虽然他深知“亲知投遣未能报，颜厚不言心自慙”，侄儿们高兴而来，扫兴而归，心中甚是怨恨，但他始终认为“欲求生前真富贵，但求诗书窗下读”，这是梅庵公以自身的经历在告诫旁人，不付出哪有回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送人以明确而管用的人生哲理和生存之道，看起来不近人情，实际上这才是真正的无限大爱。

全诗结尾是梅庵公的几许遗憾和几分感叹，在朝为官，报效朝廷，治理天下，这是古代为官者尽职尽责的准则。但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对此梅庵公感到十分的内疚，只能拜托家乡的宗亲每逢祭祀代为表达，对宗族墓地，他还怀有另一份特殊的感情。梅庵公身为京官，俸禄有限，除了日常开销，还要经常资助国子监学生，每月所剩无几，但他对此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守约甘贫分所安”否则就“庶免乖违愧儒服”。为尽孝心，他曾答应出资三十两白银扩大西盖的家族墓地，但一直囊中羞涩，迟迟未能兑现，后来还是在担任朝廷的经筵讲官，得到皇帝的赐赏后，才了却尽孝心愿。

梅庵公主政国子监司业，除了日常的教学管理考核，还负责向朝廷吏部推荐各类后备干部，每个贡生的水平高低，能力大小、适合官职，都由他来评判推选。在朝期间，还主持过山东、山西的多场乡试和礼部的会试，可谓“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但他

坚决拒绝收受不义之财，对额外之财亦冷眼相对。正统元年，按照历朝惯例，应由朝廷官员到各处代祀前朝帝王先师祖陵和岳镇海渚。梅庵公也奉旨赴山东曲阜拜祭孔庙，大明宗室鲁王定要以礼品相送，梅庵公坚持“公务活动不能接受私赠”，后来不得已才收下鲁王的几件诗作，此事一时传为美谈。梅庵公的高风亮节为朝廷所推崇，为百官所敬佩。

公元1451年，正统易位，景泰登基，是年梅庵公已经六十有一，自感体力不支，便三次上奏朝廷要求致仕。但对于这样的名臣硕儒，朝廷焉会不用。景泰次年梅庵公死于任上，朝野震惊，百官哀泣，朝廷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六部九卿，高官大臣都到场哀悼。另，以商辂（明代唯一连中三元者，后任户部尚书）为首的门生弟子共一百九十六人合议，欲请朝廷加以美谥，但按旧规，皇朝臣僚非三品以上不谥，梅庵公官秩才从五品，例不得谥，但他们认为梅庵品德高尚，非同一般，“礼以义起、谥可私称”，最后给梅庵公以“文节”谥称，具体来讲“道德博厚”、“勤学好问”为“文”，“谨行制度”、“好廉自克”为“节”，此例不说在有明一代，恐怕数百年以后也是绝无仅有的。

就像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诗歌是更能表达作者内心世界和真情实感的体裁之一，梅庵公利用送侄回家一事，就题展开，借题发挥，向我们亮出他的所思所感所悟所愿，在理智和情感之间如何进行抉择，在做好官和当清官之间怎样兼顾互补，表达了一位恪守中国儒教文化传统的学者官员严格自律，洁身自好，效仿圣贤，追求完美的高风亮节。在过去的历朝历代中，这样的清官廉吏也许不在少数，但能面对这种十分敏感的题材，敢于下笔触动发挥的却为数不多，正因如此，此诗在今天也是值得一读的。

赵德明，常州市谱牒文化研究会会员。

归档文件收集不全的原因与对策

李香花

归档材料收集是档案工作的基础，如果材料收集不全，或人们要查档利用的档案大多根本没有收集归档，那么档案工作的规范化、现代化就成了空架子。当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各种形式的档案越来越多。社会法制化程度逐步提高，档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发展，我们要特别强调归档文件收集的完整性。

我在指导下属单位档案业务的工作过程中，分析了一些单位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发现导致归档材料收集不齐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材料的收集、归档责任不明确。有些单位没有建立综合档案室，没有建立档案管理网络，档案人员只负责某一部分档案的收集、归档工作，对其他档案没有明确的归档和管理要求，致使其散存在各部门。

二是档案工作和相关人员责任心不强。有些职能部门不按要求及时整理移交材料，而档案人员也不及时催收应归档的文件材料，不管材料是否齐全，送来多少归多少，甚至认为归档材料少一点还可以减少工作量，导致归档材料不齐全。

三是档案人员对哪些材料需要归档认识不清。有些单位没有完善的档案工作业务标准，档案工作人员业务又不是很熟悉，对具体的有哪些材料应归档不是很清楚。其他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则更不清楚。导致有些该及时归档的重要材料没有归档，而不必要归档的文件材料反而移交到了档案室。

四是有些职能部门和人员不配合移交归档。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有些是觉得放在身边自己利用比较方便而不愿归档；有些是对档案人员的工作不放心或者

不满意而不愿归档；有些是因为工作做得不够规范，归档材料拿不出手；还有些人员试图将工作中形成的一些材料据为己有。

根据以上原因分析，我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归档文件的完整性。

一是建立档案工作网络。档案工作涉及单位工作的方方面面，仅靠档案工作人员，不可能把一个单位各种门类和载体应归档材料都收集齐全。因此，必须建立单位的档案工作网络。上面要有分管领导帮助协调和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下面要有各部门的支持配合，各种门类和载体档案的收集、归档责任都要落实到具体人员。比如专业档案由相关科室的相关人员负责；声像档案由拍摄人员负责；电子档案由信息技术人员负责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网络要切实可行。有些单位建立档案工作网络的文件也发了，档案工作网络图也挂在了墙上，但并没有落实到位。有些网络人员甚至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所以关于档案工作的事情还是档案人员单枪匹马在做，这样停留在纸上的网络形同虚设。健全有效的档案工作网络，要求每个网络人员都必须明确其职责和任务，并根据档案工作需要适时组织网络人员开展一些活动，如档案业务学习、工作安排和工作总结等。分管领导也要督促和协调网络人员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档案工作。

二是必须建立归档材料收集的约束和考核机制。在档案工作中，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宣传档案法律法规，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人们的档案法制观念和档案意识，加强人们做好档案工作的自觉性。但

这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要想在短期内提高归档材料的完整性，还必须采取一些硬措施来强化人们的工作责任心，约束人们的行为，促进工作的规范性，保障归档材料的完整性。要将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纳入正常的工作程序，成为各项职能工作的一个标准环节，要让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就注意应归档材料的收集积累，而不是作为年底的一项突击性工作。要对各类档案材料的收集移交提出具体的期限和质量要求。将各项职能活动中形成的应归档的材料收集移交情况，真正列入对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工作考核。档案室人员负有对各部门文件材料收集归档进行指导和督促的责任，要根据规定及时进行相关档案的催收。分管领导要经常检查了解档案工作情况，严格按考核标准落实相关奖惩措施。对于基建档案、设备档案等需要外单位提供的档案，必须在相关合同中明确要求设计、施工、监理、供货方提供完整准确的档案，并要有相应的保障措施。

三是要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完整而详细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一个单位的档案包括多种门类和载体形式都很多。如果没有一个全面具体的文件归档范围，前面所说的考核等措施都会因缺乏明确的业务标准而难以实施。在实际工作中，即使人们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也可能因考虑不周而遗漏一些重要材料，从而导致应归档材料的散失。因此，每个单位都应当根据国家档案局关于文件材料归档范围的规定，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本单位全面而具体的文件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制定程序上，首先，档案人员要深入各职能部门，了解其各项职能活动的程序，摸清各部门工作中可能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然后根据材料价值剔除不需要归档材料，按部门详细地列出其各项工作中形成的应归档文件材料的清单。接着与各部门进行相应的沟通和讨论后，完善应归档文件材料的清单，形成比较完善的归档范围。最后交单位主管领导进行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归档范围一定要全面，各种门类和载体的文件材料都要包括，任何一个部门工作中形成的应归档文件材料都不能缺少。特别要注意一些非正式文件，如调研报告、总结、内部文件和会议材料都不能遗漏。

四是档案人员要加强业务学习，熟悉本单位的工作。档案室人员在档案工作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在档案收集工作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上，他们要向分管领导及时反馈档案收集移交情况。要就如何完善分工、加强考核、改进工作程序，从而更好地做好收集、归档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下，他们要对档案

工作网络人员和各业务工作部门的收集工作进行指导，对移交的材料进行验收把关。因此档案室工作人员一方面要加强档案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也要熟悉本单位的各项业务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地将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更好地做好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总会有一些材料没有明确地被列入归档范围，而且这部分材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历史和现实利用价值，如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等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材料。如果相关业务部门没有及时移交归档，档案人员又不了解全局工作情况，没有及时催收，档案就很可能散失。因此，档案室人员应全面掌握有关情况，要根据单位工作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对归档范围进行修订完善，并认真催收，才能确保各类应归档材料都及时收集归档。同时，只有加强业务学习，才能提升档案室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这直接影响着各部门收集移交文件材料的积极性。如果档案室人员能够科学地管理好各类档案，热情耐心细致地接待各部门查阅借用档案，能够迅速准确地帮助利用者找到所需材料，甚至为配合有关部门的工作，能积极主动地提供有关档案，那么各部门也会乐于将材料移交到档案室。反之，则不利于材料的收集、移交工作。

归档材料的完整性是做好档案工作的基础。这个基础不牢，档案事业的高楼大厦也就不可能稳固。因此，在当前强调档案工作规范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同时，我们始终还要强调归档材料完整性的重要性。要综合运用各种措施确保材料的完整，在档案中留下完整准确的历史资料，才能更好地发挥档案工作的服务功能。

李香花，供职于常州歌舞剧团。

金猴献瑞

——冯文亮猴画作品展

3月19日—27日，由武进区文广新局、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主办，武进区博物馆、武进区紫薇书画院、商城书画研究院承办的“金猴献瑞——冯文亮猴画作品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冯文亮先生猴画精品90余幅。

冯文亮先生长期从事猴画研究，广泛搜集历代有关资料并注意观察能见到的各种猴子，在画中寄托了自己的喜怒哀乐，并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猴子系列画作。他的作品不局限于传统水墨的空灵通透，而是更强调厚重健峭的笔墨，并以斑斓丰富的色彩去表现瑰丽迷人的大自然。



TIME

2016年3月19日-27日

金猴献瑞——冯文亮猴画作品展

武进区文广新局、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书法家
武进创作培训基地主办



武进天工

——首届武进工艺美术精品大展

4月8日—18日，由武进区委宣传部、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武进区工艺美术家协会、常州市工艺美术家协会、武进广播电视台、武进区博物馆承办的“武进天工——首届武进工艺美术精品大展”在我馆举行，此次精品展展示了35位工艺美术优秀工作者，100余件精品力作。包括国家级非遗项目留青竹刻、象牙浅刻、省级非遗项目乱针绣、烙画、陶刻、铜雕等。区领导江建文、张美、周耀南出席开幕式。



TIME

2016年4月8日-18日

武进天工——首届武进工艺美术精品大展
武进区委宣传部、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紫气东来 圣旨驾到

——徐州圣旨博物馆馆藏圣旨精品展

4月20日—6月15日，由徐州圣旨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主办的“紫气东来 圣旨驾到——徐州圣旨博物馆馆藏圣旨精品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精品圣旨48件。

本次展览除了展出我国古代的圣旨外，还有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的圣旨，及放置圣旨的器具、古代官员和夫人的行头等。整个展览详实、清晰地展现了明清圣旨发展的脉络，其内容丰富、结构流畅、个性鲜明，尽显明清两代金碧辉煌的皇家风范。



TIME

2016年4月20日-6月15日

紫气东来 圣旨驾到——徐州圣旨博物馆馆藏圣旨精品展
徐州圣旨博物馆、武进区博物馆主办

精神田园的歌者

——著名画家王建树山水画作品展

4月20日—27日，由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西安中国画院、陕西当代国画艺术研究院主办，武进区博物馆、武进书画院承办，江苏博隆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协办的“‘精神田园的歌者’——著名画家王建树山水画作品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作品40余幅。

王建树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安中国画院副院长，在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的山水画作品融合长安画派精神的继承与创新发展，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气势博大豪放、细致沉稳，让人们感受到与众不同的山水画的魅力。

王建树的绘画作品给常武地区的书画爱好者带来纯正的艺术气息，也带来当代美术作品文化现象的新思考，起到了净化世俗回归自然生活的作用，产生继承中国传统创新发展的新感受。



TIME

2016年4月20日-27日

精神田园的歌者——著名画家王建树山水画作品展
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西安中国画院、陕西当代国画艺术研究院主办

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 ——钱卫清书法艺术展

5月18日上午，亚洲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著名律师、大成书画院院长钱卫清先生举办的个人书法艺术展在我馆开幕。本次展览活动由常州市文联、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武进区博物馆、武进区龙承博物馆承办。

下午，钱卫清先生主讲“中国民间博物馆发展的法律法规解读”的专题讲座在学术报告厅举行。讲座从“延安倒卖文物案”、“王刚砸宝案”等多个真实案例，剖析了当前文物鉴定的乱象，系统地解读了与民间博物馆相关的法律条文，为其发展提供指导性意见。



TIME

2016年5月18日

庆祝5.18国际博物馆日——钱卫清书法艺术展
常州市文联、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



翰墨浓情颂党恩

——武进区纪念建党95周年书法美术精品展

6月28日上午，由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宣传部和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武进区书法家协会、武进区美术家协会承办和武进区博物馆承办的“翰墨浓情颂党恩——武进区纪念建党95周年书法美术精品展”在我馆开幕，共展出区文联系统省级以上会员作品60幅。市、区领导荣凯元、江建文、周耀南出席开幕式。

此次展览是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又一重要举措和具体实践。本次书画作品展既是讴歌中国共产党建党95年来的光辉历程，又是对中华民族上下求索、艰苦奋斗的心路历程的献礼，同时也为书画家们提供了抒发情感的新平台。他们用馨香的笔墨，描绘大好河山，寄托浓厚的情怀，赞美家乡的建设成就，以精美的书画作品向武进人民汇报，展现了美丽武进的繁荣景象与新时代翻天覆地的变化。



TIME

2016年6月28日

翰墨浓情颂党恩——武进区纪念建党95周年书法美术精品展
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宣传部和武进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玉说 ——玉润堂珍藏明清玉器特展

6月28日，由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武进区博物馆、玉润堂艺术馆承办，武进区湖塘博物馆协办的“玉说——玉润堂珍藏明清玉器特展”在武进区博物馆开幕，共展出“玉润堂”藏明清玉器精品100件。

本次展览展品为玉润堂刘文建积30年时间收集，分文人之雅好、日常佩饰、吉祥如意三单元。其中既有精巧饰品构思奇妙，又有大件玉雕气势恢宏。在这个展览上既可观玉质之美，又能鉴玉工之精，还能赏纹饰之丰，能以玉话吉祥幸福，探明清社会生活之幽微。



TIME

2016年6月28日

玉说——玉润堂珍藏明清玉器特展
常州市武进区文广新局主办



2016年1-6月武博纪事

2015年12月26日—2016年1月3日,“‘童心洒七彩 妙趣萌春秋’童创公益画展”在我馆举行。

2015年12月底,常州市考古研究所、武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太湖水下考古(常州片)勘探、试掘工作。

2015年12月31日—2016年4月10日,“觅瓷·德霖斋藏瓷器特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唐宋辽金元时期瓷器50余件。

1月8日—2月28日,“百猴迎春”徐培晨作品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作品30余件。

1月10日,我馆举行志愿者年终总结表彰大会。

春节假期,我馆参观人数达15075人,其中未成年人777人。结合展览,开展了“缤纷冬日——我在武博过大年”系列博物馆教育活动26场,参与人数4170人次。

1月26日,我馆参加常州市博物馆学会2015年年会。

2月初,历时近2年的努力,《武进博物馆典藏精萃》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2月18日下午,以色列驻华公使Idit Shamir一行参观我馆,国家发改委李司长、经开区赵主任等陪同。

2月21日晚,常州市武进区第二届少儿艺术节“金猴闹元宵·武博赏花灯”元宵花灯会在我馆举行,活动当晚共有1300余名游客参与。

2月24日,我馆按照区文广新局工作部署,参加了武进区电视台“政风热线”栏目——武进区博物馆专场的节目录制。武进区博物馆馆长施建刚、副馆长张宇接受访谈,并与多名热心观众进行现场交流互动。节目在录制的同时,武进广播电台、阳湖网进行了现场直播。

2月26日下午,我馆赴湖塘实验小学,举办“奇妙武博——人文武进·英才辈出”历史名人讲座,共有53名师生参与。

3月2日下午,武进区副区长是峰一行调研我馆,区文广新局局长范正洪、党组书记韩家兴陪同。

3月3日,山东邹城市党政代表团一行23人参观我馆,副区长许让磊陪同。

3月6日,“环太湖艺术城”杯常州市民最受欢迎的民间十大珍宝评选活动的颁奖仪式在环太湖艺术城艺术展览馆举行。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周晓东、文物处处长唐星良,市博物馆学会会长陈丽华,区文广新局局长范正洪、党组书记韩家兴等市、区领导出席。

3月7日,我馆全体职工赴雪堰镇开展博物馆工会“迎‘三八’妇女节暨第三届‘武博趣味运动会’”。

3月17日,我馆赴南京莫愁职业技术学校洽谈2016年馆藏纸质文物修复工作,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3月19日—27日,“金猴献瑞——冯文亮猴画作品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冯文亮先生猴画精品90余幅。

3月23日,无锡阖闾城遗址管理委员会一行19人参观我馆,区文广新局党组书记韩家兴陪同。

3月24日,山东泗水县党政代表一行20人参观我馆,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建文陪同。

4月1日下午,“2014—2015年度常州‘爱国筑梦·奋斗圆梦’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仪式在烈士陵园举行,施建刚馆长出席并接受先进集体荣誉表彰。

4月1日—4日,由常州涂图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武进区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常州市武进区第二届少儿艺术节——放飞中国梦·武博清明风筝节”活动在我馆举行。共展示各类风筝作品120件,参观人数达8143人。

4月6—7日,施建刚馆长率队赴厦门博物馆开展“指尖上的非遗——常州徐氏三刻作品展”前期对接工作,完成初步方案的制订及借展协议的商讨。

4月8日—18日,“武进天工——首届武进工艺美术精品大展”在我馆举行,区领导江建文、张美、周耀南出席开幕式。

4月11日—14日,施建刚馆长率队一行6人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参加常州市文广新局、常州市博物馆举办的常州市文化遗产保护高级人才培训班。

4月中旬,我馆收到江苏省文物局关于武进区博物馆馆藏12件金银器(1件一级、9件三级)借展苏州博物馆“金色江南”特展的正式批复。4月21日,苏州博物馆一行3人赴我馆提取借展文物并办理交接手续。4月26日,我馆副馆长芮路俊带领张彩英、吴世昌赴苏州博物馆参与展览布展工作。

4月20日—6月15日,“紫气东来 圣旨驾到——徐州圣旨博物馆馆藏圣旨精品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徐州圣旨博物馆馆藏圣旨精品48件。

4月20日,“精神田园的歌者——著名画家王建树山水画作品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40余幅作品。

4月22日,武博国学大讲堂之“‘古服华彩’——明代服饰”专场讲座走进牛塘中心小学小百灵剧场,共有400多名师生参与。

同日,我馆全体员工参加区文广新局“文馨惠民心连心道德故事颂真情”道德讲堂活动。

4月30日—5月6日，由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中国书画创作研究院、武进区文广电闻局主办，武进区博物馆、武进区书画院承办的“云山清远——高寅山水画展”在我馆举行。共展出精品画作40余幅。

4月30日，我馆参加了武进区总工会在区行政中心组织召开的全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大会。副馆长张宇代表博物馆接受区总工会颁发的“武进区五一劳动奖状”。

5月，我馆结合“紫气东来 圣旨驾到——徐州圣旨博物馆馆藏圣旨精品展”，开展“皇帝的工作”、“皇帝的玉印”、“皇帝的新衣”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共有36名学生参与。

5月4日—6日，陈列开放部王丽娜、孙斌参加“2016年常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负责人培训班”学习。

5月8日—15日，由武进区委宣传部、武进区文广新局、武进中国春秋淹城旅游区管委会、江苏门票收藏联谊会主办，武进区博物馆、常州市春秋淹城旅游门票收藏联谊会承办的“第四届市民艺术节暨‘怡建杯’江苏省第九届旅游门票收藏展”在我馆举行。

5月15—16日，施建刚馆长赴淮安参加“江苏省博物馆馆长大会暨2016年全省馆藏文物巡回展启动仪式”。

5月18日上午，新科集团藏《三峡史诗》巨幅通景山水画捐赠仪式在我馆隆重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建文，区文广新局局长范正洪，原区文广新局党组书记韩家兴，新科集团董事长秦志尚，著名画家秦剑铭、朱修立参加捐赠仪式。

5月18日上午，“钱卫清书法艺术展”在我馆举行。同日下午，钱卫清先生主讲的“中国民间博物馆发展的法律法规解读”专题讲座在学术报告厅举行。

5月19日下午，江苏省储宁玲少先队名辅工作室“蒲公英”博物馆教育课程之旅暨卢家巷实验学校、洛阳中心小学馆校共建挂牌签约仪式隆重举行。

同日，5.18国际博物馆日暨科技活动周专题活动——“我们看武博”专题博物馆教育活动在我馆举行，来自卢家巷实验小学、洛阳中心小学的近百名师生参与。

5月22日，由施建刚馆长率队一行7人，赴常州博物馆参加由省文化厅副厅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主讲的博物馆展览知识讲座。

5月26日下午，“武博国学大讲堂——‘古乐雅韵’古代乐器”专场活动走进洛阳中心小学。本次讲座共吸引了150多名师生参与。

6月7日，我馆与南京莫愁图书保护修复中心签订《馆藏文物保护修复委托合同》。

6月9日—11日端午节期间，恰逢我国第十一个文化遗产日。围绕“粽情端午少儿艺术作品展”开展“七彩端午——

编制五彩网兜”博物馆教育活动，共计6场78人参与。

6月15日，我馆新更换的消防主机通过武进区公安消防大队测试验收。

6月19日下午，武进区安监局组织专家一行5人对区名人馆进行安全检查。

6月21日，我馆举办第1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消防知识讲座”。

6月25日，“武博国学大讲堂——‘古香粉黛’古代妆发”活动在我馆少儿社教体验区举行，由15位汉服社志愿者协助，共10组亲子家庭参与。

6月27日，武进区博物馆支部全体在职党员参加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6月28日，“玉说——玉润堂珍藏明清玉器特展”在我馆开幕，共展出“玉润堂”藏明清玉器精品100件（组）。

6月28日上午，“翰墨浓情颂党恩·武进区纪念建党95周年书法美术精品展”在我馆开幕，共展出区文联系统省级以上会员作品60幅。

漫话清宫扇



图1、清孔雀翎眼面白羽毛折扇



图2、清象牙柄雕翎扇



图3、清红木柄绿缎彩绣博古纹扇



图4、清黑漆柄绢面彩绘牡丹团扇



图5、清檀木柄黄地缙丝荷花双蝶团扇



图6、清乌木嵌银丝股曹文植书折扇



图7、清乌木股泥金笺设色花鸟折扇



图8、清牙柄绢面绘牡丹团扇



图9、清木柄藤草编镂空小团结扇



图10、清黑漆柄麦秸编团扇



图11、清黄木柄竹编小团扇



图12、清竹柄竹编仁寿纹扇



图13、清象牙柄芭蕉扇



丙申年2016